

# 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

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

谢尔玛·詹姆斯

马新 Orpheus 邓宁立 译

2017

副本制作 · 欢迎翻印

## 目 录

为什么仍需要讨论家务劳动？（吴碧莲导读） …	1
------------------------	---

### 妇女与社会翻转

资本主义家庭的起源 .....	18
教育中的阶级斗争 .....	21
对无工资者的剥削 .....	25
证实有关“女性无能”的迷思确实存在 .....	29
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 .....	31
劳动分工的同性恋 .....	33
剩余价值和社会工厂 .....	35
A. 雇佣奴役的生产力是基于“无工资的奴役” …	37
孤立劳动者斗争的社会化 .....	41

阶级斗争的新方向 .....	46
拒绝工作 .....	50
B. 被动性的生产力 .....	52
死亡劳动和性的痛苦 .....	54
针对妇女的“政治”攻击 .....	56
1. 作为消费者的妇女 .....	58
2. 作为竞争对手的妇女 .....	61
3. 引起分裂的妇女 .....	63
C. 规训的生产力 .....	65
妇女与拒绝工作的斗争 .....	68

## 妇女的位置

单身妇女 .....	77
“喂,你们吓到我了!” .....	79

已婚妇女 .....	80
孩子 .....	81
分裂的家庭 .....	82
房子 .....	84
她们过着分开的生活 .....	86
女人了解女人 .....	88
新的关系 .....	91
职业妇女 .....	93
所有事情都将由我们做主 .....	96
每个女人知道 .....	98
初版前言 .....	101
注释 .....	122

## 附 录

家务劳动的工资（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	141
1970年代意大利的女权主义、工人主义 及自主主义（帕特里克·卡宁厄姆） .....	163



## 为什么仍需要讨论家务劳动？

吴碧莲 导读

“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被称为中国女人的四不幸。一直以来，家务劳动被当做是妇女的“天职”，而“外出工作、抛头露面”则是不符合女性气质的表现。当代的劳动妇女常常肩负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面对现代女性的生活困境，许多人提出了“妇女回家”的方案，认为妇女回归“女德”、呆在家里相夫教子、料理家事，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实际上，早在 1970 年代，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就有对“妇女回家”迷思强有力的批驳。家庭真的是温暖的港湾么？为何无酬的家务劳动是在为资本家服务？回到今天中国的情境，我们又可以怎样借鉴意大利妇女运动的遗产呢？



## 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

“女性所做的是高达平均每周 99.6 个小时的工作，既没有罢工的可能，也无法缺席，也不能提出任何要求，是完全无偿的劳动。”（毕安卡玛利亚·弗拉波塔 [Biancamaria Frabotta]）

1950-1960 年，二战后的意大利经济迅速增长，农业生产减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上升。1963-67 年之间，意大利的经济开始萎缩，大量的纺织厂、食品厂倒闭，许多会雇用妇女的行业都在衰退，妇女的失业问题变得严峻起来。

1959 年，意大利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比重是 33.3%。而到了 1960 年代中期，妇女的失业率成为一个问题。1969 年，妇女只占了总劳动人口的 25.1%，到了 1973 年，这个比重只有 17%。（数据来自莫德·安妮·勃拉克 [Maud Anne Bracke]《妇女与政治：意大利女权主义革命 1968-1983》）

妇女在职场上面临的歧视有增无减。找不到工作的意大利妇女，在家里从事一些缝纫、食品加工和文

书之类的工作。面对广泛妇女贫困问题，当时受到工人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权行动者发起了“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让整个社会看到家务劳动的作为一项为资本服务工作的价值。

当时，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女权主义者都普遍认为，外出打工是妇女解放和“加入工人阶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工人主义女权认为，妇女无偿家务劳动实际上为资本生产了剩余价值。妇女在家像奴隶一样，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劳动者。（参看收入附录的帕特里克·卡宁厄姆 [Patrick Cuninghame] 《1970年代意大利的女权主义、工人主义及自主主义》）

“家务有偿化”试图把无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家庭领域的斗争和雇佣工人联合起来，一齐反对资本。这场运动的战火很快从意大利烧到了英美，并组成了“国际女权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llective）这样的国际网络。

全球的“家务有偿化”运动不单单是各地区家庭主妇组织起来抗议，还连接了大量学生抗议、黑人民权、社区工作的内容。这项运动也不单单反对资本透过家务劳动，把再生产的代价转嫁给家庭和妇女，同

时还纳入了反家暴和妇女性自主的议题。

那么工人主义女权究竟是怎么理解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性别压迫和阶级剥削之间的关系呢？

为什么“家庭主妇”是给资本家打工？

在《妇女与社会翻转》(1973)中，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论述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核心问题：劳动性别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和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

虽然，父权社会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资本主义。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而出现的性别劳动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今天妇女受到压迫的形式。在前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家和家庭仍然是生产的核心。所有的农奴都是为封建领主服务。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不自由”。

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逐渐以工厂和办公室为中心，男人脱离了家庭，变成了雇佣劳动者，进入到公共领域，而女人则被隔离在家中，从事无酬的家

务劳动。“男主外、女主内”成了主流。

这样的性别劳动分工将妇女隔离起来，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大多数妇女无法成为雇佣工人，不具有受薪劳动的自由，只负责生育照顾下一代劳动力。同时，资本主义以核心家庭为范本，要求女人在家里必须得服从男人。

资本主义在西方制造劳动性别分工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如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中论述过的圈地运动——资产阶级在15-19世纪的几百年里，圈占公有土地进行原始积累。失去土地的（男性）农民成了乞丐和流民。而国家机器的法令，以极端暴力的手段，禁止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流浪，强制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给资本家打工。

而另一方面，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在《卡利班与女巫》（2004）里指出，中世纪的“女巫猎杀”运动对于把妇女禁锢在家中至关重要。15-17世纪，超过十万的妇女被指控为女巫而处死。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通常是服从“男主外、女主内”这种劳动分工的女人。她们是起义者、治病术士、接生婆、不遵从性/别规范的人以及传播避孕和堕胎知

识的人。她们既不成为雇佣劳工也不为家庭提供无偿劳动。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暴力里，妇女越来越受制于父权，经济独立女人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娇妻。这样的性别分工下，妇女很难进行各种创新和开发的工作，也难以自主表达她们的性、心理及情感。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女人天生就没有能力从事这些工作。这样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让一代又一代的妇女不断地否定自我。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系统论述了资本如何透过工资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政党认为，家庭主妇仅仅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事实上，她们的劳动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至关重要。

除了少部分妇女离家成为女工，大多数妇女呆在家里。外出打工的妇女被大量集中在某些工“适合女人”的行业里，工资远远低于男人。相比男性工人，女工遭受的不公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从那时起便有人呼吁，妇女还是呆在家里比较好。

“家庭能够保护妇女”，这一观点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它忽略了家庭主妇角色的真正本质——“无

工资的奴役”。长期以来，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总是被认为不具备生产力的。然而，没有妇女在家中勤勤恳恳的劳作，谁来给男工人们做饭洗衣，谁来帮资本家抚育下一代劳动力呢？

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服务几乎都成了私人的责任，全部放在了家庭主妇的肩上。她们日复一日从事清洁、做饭、繁衍、育儿等“再生产性的劳动”。一个个的妇女被孤立在家里生儿育女，并规训新一代的劳动者。妇女是生育机器，是管家婆。她们被剥夺了身体完整性（physical integrity）、性和劳动的创造力。

家庭主妇的“被动性”对于资本家而言具有“生产性”。首先，把“逆来顺受”作为美德的妇女是男性在家外遭受压迫的发泄口，她们面临着受挫工人阶级男性的家庭暴力。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矛盾。妇女成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安全阀。

其次，“家庭主妇”为核心的女德彻底否认个人自主性。性的创造力和劳动的创造力同时被抑制了。别无选择的女人将家务劳动崇高化，努力成为“英雄母亲和幸福妻子”。她们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追

求近乎完美的干净整洁，“在洁白无瑕的床单上透过干净的性行为获得幸福”。

妇女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隐形的角色，而这种家庭模式却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雇佣奴役的生产力是基于“无工资的奴役”。“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达拉·科斯特总结道。

而妇女运动势必要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建立起来的核心家庭，夺回对性、对身体、对劳动的控制。

## 家务劳动与中国妇女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家务劳动已经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迅速商品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输出了大量的以妇女为主的劳动力从事再生产劳动。家务劳动以商品化的方式实现了“有偿”。

而当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已经变成了中上阶层的特权，绝大多数妇女需要外出打工，面临工作与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同时，在中国从事照顾性劳动的

妇女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很大一部分再生产 / 照顾性劳动转嫁到了退休老人、留守老人的身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母职变得愈发神圣化、崇高化。二胎开放后，职业妇女被期待生育更多的孩子。抚育下一代劳动力的代价依然要求这些妇女一并承担。

“家务劳动有偿化”这个曾经广泛地动员了欧美妇女的号召，似乎不再能让今天的中国妇女感同身受。但是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分析并没有过时。只要关于男女的性别劳动分工还没有打破，只要社会再生产的代价依然由个人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妇女（无论是老一辈妇女，还是雇来的家政工）承担，家务劳动依然会是当代女权运动需要面对的重要维度。





# 妇女与社会翻转

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Mariarosa Dalla Costa

---

标题据意大利原文“Donne e sovversione sociale”译出，若据英译，则系“妇女与社区 / 社群颠覆”。特此说明。

以下评论尝试对“妇女问题”进行定义和分析，并将该问题置于被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创造的全体“女性角色”中进行讨论。在本文中，我们以家庭主妇作为女性角色的中心进行探讨。我们认为每一位妇女都是家庭主妇，甚至那些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妇女亦是如此。换言之，家务劳动不仅按照劳动时间和劳动性质来衡量，还以其生成的生活和关系性质来衡量，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家务劳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妇女的地位，与身在何方、属于哪一阶级无关。在本文中我们虽然关注的是工人阶级妇女的处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工人阶级的妇女才受剥削。相反，本文旨在证实工人阶级家庭妇女扮演的角色对于其他所有妇女的处境具有决定性，而前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切将妇女看做是一种社会“种姓”（caste）<sup>[1]</sup>的分析都必须从对工人阶级家庭妇女处境

的分析出发。为了以家庭主妇为中心进行讨论，首先需要进行简要地分析，包括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摧毁各种已有的家庭和共同体类型以形成现代家庭的，以及家庭主妇在现代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资本主义对家庭和共同体的摧毁过程尚未结束。尽管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就西方世界尤其是意大利展开讨论，但我们希望澄清的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控制着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对各种已有的家庭和共同体类型的摧毁必然发生或已经开始。我们也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所熟知的拥有先进技术西方国家的家庭形式，是家庭在资本主义下所能呈现的最终形式。但若要对各种新趋势进行分析，就必须先对资本主义如何形成了今天的家庭形式，以及妇女今天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并将其看作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时刻进行分析。我们还打算通过对在家庭之外工作妇女的处境进行分析，完善对女性角色的探讨，但是鉴于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只能另文再议。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展示两种独立体验之间的联系，即作为家庭主妇的体验和作为工作妇女的体验。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妇女日常斗争，直接与工厂组织和家庭

组织进行对抗。自那以后，妇女在家庭内外的“不可靠性”迅速增加，并直接与工厂通过时间和空间展开的管制进行对抗，与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组织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sup>[2]</sup>进行对抗。青年男女工人更易旷工，更不遵守时间安排，工作流动性更高。但是，在青年时期的关键时候，男性往往是新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整体上女性则不用受此束缚，但却必须一直考虑家务劳动，因此女性注定更不遵守工作纪律，破坏生产流程，提高资本成本。（这也是实行歧视性工资的一个借口，歧视性工资一般数倍于资本损失的补偿数额）。无法遵守工作纪律也是家庭主妇们在将孩子留给工作丈夫照看时的说法。<sup>[3]</sup>这一趋势正是也将越来越成为工厂和社会工厂体系中危机的决定性形式之一。

\* \* \*

近几年妇女运动频发，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运动拥有不同的指向和范围，其中有些人认为社会的根本冲突是男女之间的冲突，有些人则认

为妇女的处境是阶级剥削的具体表现。乍一来看，前者的立场和态度较为复杂，对于那些之前参与过激进政治斗争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认为应当指出的是，那些以性剥削作为基本社会矛盾的妇女，是显示我们自身挫败程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妇女运动内外数以百万计的妇女都有过这种挫败感。有些人是这样定义她们的女同性恋关系的（在此我们特别涉及美国运动中的一些观点）：“因为我们同女人在一起，所以我们承认不再忍受同男性的关系。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将妇女放在从属地位的权力关系。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被转移了，我们的力量被分散了，我们的目标被限定了。意识到这些，我们与妇女的联合便会开始。”基于这种对异性关系的拒绝发展出的一场女同性恋运动，认为有可能构建一种没有性权力斗争、没有生物社会单元的关系，同时认为我们需要接受更多的社会可能性和性可能性。现在，为了解释妇女以越来越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挫败感，我们必须明确是资本主义家庭的本质导致了这种大规模危机的出现。但是对妇女的压迫毕竟在资本主义出现前便已存在。资本主义加剧了对妇女作为女性的剥削，却

也带来了最终解放的可能性。



## 资本主义家庭的起源

在资本主义出现前的父权社会中，家和家庭对于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来说至关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社会化生产逐渐以工厂为组织中心。那些在工厂这一新生产中心里工作的人们可以得到工资，进不了工厂工作则领不到工资。由于家庭得依赖于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劳动，所以他们失去了家庭所赋予的相关权力，而这却被认为是社会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必要的。资本摧毁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共同体和生产，一方面这将基本社会生产集中于工厂和办公室里，另一方面则从本质上让男人脱离了家庭，将其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男人必须肩负起为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简言之是肩负起为所有没有工资的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从那时起，那些无法生育、无法为工资赚取者提供服务的人开始被从家里驱逐出来。首先男人离开了家，然后是

孩子；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家庭不仅失去了生产功能，也不再是教育中心。<sup>[4]</sup>

男人基于严格的劳动分工担任着父权家庭专制领袖的角色，以至于妇女、儿童和男人的体验从获得时起便具有了矛盾性。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农奴共同体里每一位成员的工作看起来都有着相同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封建领主的财富，要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在这种程度上，整个农奴共同体都被迫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展开合作，其中妇女、儿童和男人的受限程度是一样的，这正是资本主义需要打破的。<sup>[5]</sup>就此意义而言，不自由的个人和不自由的民主<sup>[6]</sup>同样面临危机。在从农奴制到自由劳动力的发展过程中，男性无产阶级同女性无产阶级分离开来，两者再同他们的孩子分离开来。不自由的男性家长转变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两性和世代的体验变得矛盾重重，导致了更深刻的异化和更具颠覆性的关系。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儿童同成人之间的分离对于理解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分离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完全理解就妇女运动而言斗争组织只能以克服分离为目标来说至关重要，分离是以雇佣劳动的“自由性”为

基础的，就算妇女运动采取了暴力的形式、拒绝与男性建立任何关系，也只能是努力克服这种分离。

## 教育中的阶级斗争

通过对近几年新出现的学校进行分析，特别是那些伴随学生运动诞生而出现的学校，我们认为学校就是意识形态规训、塑造劳动力和老板的中心。那些可能再也无法出现，或至少再也无法达到如此深刻程度的，正是先于所有这一切之前存在的；这便是孩子第一天上托儿所时经常遇到的，当他们发现自己被丢在托儿所、父母抽身离去时，一股绝望之情油然而生。但就在这一刻，学校的故事便开始了。<sup>[7]</sup>

以此来看，小学生并不只会跟着高年级的孩子鹦鹉学舌，要求“免午餐费、免学费、免课本费”，他们也可以以某种方式同高年级的学生联合起来。<sup>[8]</sup>小学生们，工人的子弟们，往往已经意识到了学校正以某种方式令其同自己的父母和同侪进行对抗，因此他们便本能地开始抗拒学习，抗拒“接受教育”。被关在英国“智障学校”（educationally subnormal schools）

里的黑人儿童身上也出现过这种抗拒。<sup>[9]</sup>跟黑人工人阶级的孩子一样，欧洲工人阶级的孩子认为老师就是教给他们对抗父母方法的人，这种对抗不是为了孩子自己，而是为了打击工人阶级。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受剥削阶级的子女在统治阶级组织和控制的机构中接受规训和教育的生产体系。<sup>[10]</sup>

那些上了大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很少上不了大学的）洗脑洗得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无法再同自己的社群进行对话，这最终可以证明这种始于托儿所的异化灌输是以家庭分裂为基础的。

然后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了第一批出于本能反抗学校和学校教育的人。但是他们的父母之所以将其送往学校，并用学校限制他们，是因为父母们认为孩子应该“接受教育”，应该接受训练远离限制自己的流水线或厨房。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孩子展现出了某种天资，全家的关注将立刻聚焦，为其提供最好的条件，即使牺牲他人也在所不惜，全家人希望这个孩子能带领他们跳出工人阶级，并为此孤注一掷。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资本流动的方式，资本利用父母的强烈愿望，规训新劳动力。

在意大利，父母越来越没法将孩子送去上学。孩子对学校的抗拒甚至在还未组织起来时便愈演愈烈。

儿童们的抗拒随着学校教育的增加而增强，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拒绝接受资本对其年龄的定义。儿童看到什么便想要什么；他们尚未理解一个人只有付钱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为了有钱付款，必须要有工资，因此也必须是成人。怪不得很难跟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无法拥有电视告诉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但是新一代的儿童和青少年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难向他们解释，变为成年人是一个专制的时间点。相反，年轻一代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年龄：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南部，年仅六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对抗警犬了。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和北爱尔兰见到了同样的景象，儿童像成人一样积极地进行反抗。如今儿童（和妇女）已经被认为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无怪乎出现了更多儿童（和妇女）参与革命斗争的例子。新的情况是，尽管儿童被排除于直接生产之外，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参与有了“自主性”<sup>[1]</sup>。在工厂中，青少年们拒绝接受年长工人的领导，在城市

里，他们成了反抗先锋。在大城市里，好几代核心家庭都产生了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始撼动既有权力的框架：在第三世界，先是失业的年轻人在街上闲逛，然后才是工人阶级组织工会。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6月1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一次校长会议，有位校长因为打学生而受到了警告：“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因素’潜伏在各个角落，似乎计划着侵蚀所有权威的力量。‘这’是一个阴谋，企图摧毁我们赖以构建文明的价值观，我们的学校就是这些价值观的坚固堡垒。”

## 对无工资者的剥削

我们想就反抗的态度提出几点看法，这种态度正在儿童和青少年间传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和黑人的孩子间传播，我们认为这同妇女运动的爆发以及妇女运动本身必须考虑的事项密切相关。我们面对的反抗来自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被生产系统分离开来，在行动中表达了自己的需要——摧毁在“社会存在”<sup>[12]</sup>领域里阻碍他们各种力量，只不过这次，这些人是作为个体团结起来的。

妇女和儿童被排除在外。一方通过排除对剥削展开反抗表明另一方也在反抗。

因为资本雇佣男性并将其变成雇佣劳动者，才导致男性和其他所有无工资的无产阶级之间出现了裂痕，后者因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因此也被认为无法成为社会反抗的主体。

自马克思以来，大家都明白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



配和发展，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便是雇佣劳动者和对其的直接剥削。工人阶级运动组织尚不清楚或尚未接受的是，资本通过工资对无工资劳动者进行剥削。正因为无酬劳动隐藏了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实施起来甚至更畅行无阻。换言之，工资控制的劳动者数量要比工厂谈判中出现的更多。至于妇女，她们的劳动似乎成了资本之外的个人服务。表面上妇女只用忍受男性沙文主义，忍受他们的颐指气使，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普遍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坏行为”；注意到这点的少数人（男人）却想说服我们这是“压迫”，不是剥削。但是“压迫”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更普遍的一面。资本将儿童排除在家之外，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仅仅是因为孩子妨碍到了其他人更“有生产力”的劳动，或是为了对孩子进行教育。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迫使每个体格健全的人按照劳动分工发挥其作用，这即便不能立即也终将有益于资本支配的扩张和延伸。这才是学校的根本意义。至于儿童，他们的劳动似乎就变成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学习。

无产阶级的孩子被迫在学校接受一模一样的教

育：这是资本主义与学习的无限可能性进行的对抗。另一方面，在家中，妇女受到孤立，被迫进行无需技能的劳动，为生孩子、养儿育女，对劳动者进行规训、为其提供服务。她在社会生产周期内依然扮演着隐形的角色，因为只有她们的劳动成果，即劳动者，才是可见的。结果妇女囿于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中，无工资可领。

当我们说到“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时，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妇女拿着扫帚扫地。就算是设备齐全的美国厨房，也无法反映技术发展的水平；最多只能反映十九世纪的技术水平。如果不是按时计薪，在一定限度内，是没人关心你做家务的时间的。

家务和其他工作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异，还存在着质的差异，这一差异源于家务劳动生产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除非阶级和资本之间出现了对抗，否则一般而言，劳动生产力是不会提高的：技术创新和进行合作的时刻，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的时刻，是资本主义进行回应的时刻。但是就算这点适用于商品生产，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这里也说不通。就算技术创新可以降低必要劳动的限度、

工人阶级的工厂斗争可以利用创新获得空闲时间，这一点也不适用于家务；她得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生育、负责照顾孩子，家务劳动更高的机械化程度并不会省出时间。她得一直在岗，因为机器不能生孩子，不能照顾孩子。<sup>[13]</sup> 因此可以通过机械化提高生产力的家务劳动就只剩一些特定的服务了，例如烹饪、洗涤和清洁。妇女的工作无休无止，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器帮忙，而是因为她们是孤立的。<sup>[14]</sup>

## 证实有关“女性无能”的迷思 确实存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妇女囿于孤立的状态，封闭在家庭之内，完全依赖于男人。她不享有自由雇佣奴隶的新自主性，依然处于个人依赖的前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这次却更为残酷，因为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无处不在的大规模高社会化生产。妇女无法胜任某项工作、无法理解某些事务的观点源于历史，这段历史在某些方面与低能学校“落后”儿童的遭遇何其相似。只要妇女还与直接的社会化生产隔绝开来，在家中被孤立起来，她就不享有邻里之外社会生活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也不享有接受社会知识和社会教育的可能性。当妇女被剥夺了组织和策划集体工厂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的各种体验时，她们便不能接受基本教育，没有社会反抗的经验。这种经验主要涉及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换言之，了解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所处阶级的能力和力量。因此，妇女遭

到的孤立便向社会和她们自己证实了“女性是无能的”迷思。

这一迷思首先隐瞒的是，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共同体内组织群众斗争，发动集体抗租运动和针对通货膨胀的斗争，是因为以共同体内妇女不断的非正式性组织为基础；然后隐瞒的是，在直接生产周期的斗争中，妇女的支持和组织，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至关重要。到了关键的时刻，妇女网络正是通过那些“无能女性”的才能、精力和实力才得以成形并发展起来的。但是上述谬见依然存在。当妇女可以与男人一起宣布成功地渡过了失业难关，或成功地渡过了难关并取得了罢工胜利时，胜利的战利品才属于“整个”阶级。妇女就算不是没有，也很少为自己争取任何好处；很少以通过各种手段改变家庭权利结构及其同工厂之间的关系为斗争目标。不管罢工还是失业，妇女的工作远未完结。

## 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

资本主义的诞生虽然摧毁了作为人的妇女，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即减少妇女的身体完整性。资本主义出现前，男女的“性”（sexuality）<sup>[15]</sup>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各种形式的制约。虽然有过各种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但是现在这些方法已经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资本让家庭以核心家庭的形式呈现，在家里女人得服从男人，因为女人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也不会独立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妇女进行各种创新和开发工作的可能性被切断了，随之切断的还有其性、心理及情感自主性的表达。

我们认为：妇女身体完整性的缓慢发展，是不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包括从大脑到子宫的一切。与他人一起参与火车或飞机的生产，完全不同于几个世纪以来孤零零地在几平方英尺的厨房里拿着同样的扫帚打扫卫生。

这并不是在飞机制造领域呼吁男女平等，而是设想两种历史之间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实际斗争形式的差异，还揭示了一直以来处于隐形中的一些事实：过去妇女斗争的不同形式。妇女被剥夺了各种开发创造性能力的可能性，她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剥夺了性生活，性生活只是为了生育劳动力：我们关于家庭服务技术水平的看法同样也适用于生育控制（顺便提一下，同样也适用于整个妇科领域），适用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的对象总是被忽视直到最近才引起关注，不出所料，当大多数原始的节育方法不再奏效时，妇女只能生下孩子，无权堕胎。

这是一种对妇女的彻底贬谪，自此资本开始塑造女性角色，利用男性在家里贬谪女性。男人是雇佣工人，是家长，是“妇女剥削”这种“特定剥削”的特定工具。

## 劳动分工的同性恋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便可解释在何种程度上社会导致的男女之间关系的破裂决定了男女之间关系的退化，从此女性便从属于男性，被物化，成为男性的“补充”。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妇女运动中各种趋势爆发是合理的，女性欲以这种方式<sup>[16]</sup>与男性进行斗争，甚至不再希望靠自己维持性关系，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各种关系都是令人沮丧的。权力关系排除了出现任何好感和亲密关系的可能。但在男女之间，权力的权利便是控制与性相关的好感和亲密关系。就此意义而言，同性恋运动是最大规模的尝试将性从权力中解脱出来的运动。

但是一般而言，同性恋同时也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框架之中：女人待在家里，男人待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全天彼此分离；一家拥有一千名女工的工厂需要十名工头；一个打字小组（当然全由女性组



成)为五十名职业男性工作。上述情形均属同性生活框架。

资本将异性恋升级为了一种宗教，与此同时却在实践中让男女无法彼此接触，不论是在身体方面的还是在情感方面，资本除了在性、经济和社会规训方面支持异性恋，在其他方面均暗中破坏异性恋。我们认为我们应就上述事实展开讨论。同性恋趋势的爆发一直以来都对妇女运动至关重要，因为相关趋势让宣布妇女斗争的特殊性变得紧迫了起来，特别是深度阐明妇女剥削的各个方面和相互联系。

## 剩余价值和社会工厂

现在，我们需要对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流派（特别是在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点进行一些澄清。即，当妇女不在社会生产之内，不在社会生产周期之内时，她们也不在社会生产力之内。换言之，妇女往往被认为在心理上处于从属地位，除了少数女性离家工作外，大多数女性尚在生产之外；妇女本质上是一系列家庭使用价值的提供者。这基本上就是马克思的观点，是他在目睹了工厂女工的遭遇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妇女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至少在家里她们的生活方式更高尚。但是马克思从未意识到家庭主妇角色的真正本质。但是很多观察者们却已经注意到了，在兰开夏郡，一个世纪以来都是妇女在担当棉花工人，她们在性方面更自由，也有男人帮忙干家务活。另一方面，在约克郡的煤矿区，妇女很少离家工作，

丈夫更占支配地位。甚至是那些能够在社会化生产中定义妇女剥削的人，也不能理解妇女在家的剥削地位；男人在与女人的关系里变得不够公正。基于上述原因，只有妇女才能定义自己，提出妇女问题。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工资里，家务劳动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也至关重要。<sup>[17]</sup> 这点也适用于作为一种人格的整个女性角色，女性在各个层面均处于从属地位，包括身体上、精神和职业上，在追求更高社会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女性一直以来并将继续位于一个明确且关键的位置上。让我们深入地探寻，妇女作为社会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所扮演的角色。首先从家庭开始分析。

## A. 雇佣奴役的生产力是基于 “无工资的奴役”

人们往往认为，根据雇佣劳动的定义，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是不具备生产力的。事实则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将规模巨大的社会服务变成了私人活动，放在了家庭主妇的肩上。家务劳动本质上并不属于“女性工作”；跟男性相比，女性在进行洗涤和清洁时，并不会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亦不会减轻疲惫程度。由于这些工作服务于繁衍后代，故属于社会服务。而资本则通过构建核心家庭结构，将男性从相关功能中“解放”出来，自此男性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可以直接进行剥削了；自此男性能够自由地“赚”钱，让女性为其繁衍下一代劳动力了。<sup>[18]</sup> 资本成功地将男性变成了雇佣奴隶，然后又成功地将相关服务分配给了家里的妇女，借此控制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意大利，妇女对于家庭来说依然是必需的，资本依然需要这种家庭形式。大体上以欧洲目前的发展水平，特别

是在意大利，资本依然倾向于进口劳动力，从欠发达的地区进口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劳动力，与此同时把妇女困在家里。<sup>[19]</sup>

妇女提供服务，不仅仅是因为她们不计薪酬地从事家务劳动，不会罢工，还因为她们总是欢迎那些因周期性金融危机而失业的家人回家。家庭是母亲的摇篮，时刻准备着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保护，事实上这是失业者最好的保障，这样他们就不会一失业就变成一群具有破坏性的失败者了。

工人阶级运动中，有组织的政党均小心翼翼避免触碰家务劳动的问题。他们一直把妇女视为较低的一种生命形式，除此之外，甚至是在工厂里，提出相关问题也会挑战工会的整个基础，工会这种组织只负责处理（a）与工厂相关的事务；（b）可计算和“付薪”的工作时间；（c）与工资中发放部分相关的事务，不涉及被收回的那部分，即通货膨胀。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强迫下，妇女往往不得不推迟解放的时间，推到未来的一个假设时间点，并完全依赖于男性为“他们自己”争取到的利益，但其实在上述政党的限制下，男性斗争的范围亦十分有限。

事实上，工人阶级斗争的每个阶段都加剧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和剥削程度。发放家庭主妇津贴的建议<sup>[20]</sup>（令我们不禁生疑为什么发放的不是工资）只说明了这些政党十分乐意进一步将妇女制度化为家庭主妇、将男性（和女性）制度化为雇佣奴隶。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我们中没人相信通过工作可以实现解放了。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工作依然是工作。雇佣劳动者的独立性仅仅意味着不论男女对于资本来说他/她是一个“自由的个人”。那些认为只要在家外找到工作就能让工人阶级妇女实现解放的观点，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沦为流水线的奴隶并不意味着从厨房水槽的奴役中解放了出来。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流水线本身的奴役性，并再次证明了如果不了解妇女是如何受剥削的，就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男性是如何受剥削的。这一问题如此关键，我们必须单独讨论。我们想在此澄清的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干活却没有工资，这意味着丈夫也是老板。丈夫成了家庭服务的唯一接受者，这使得家务劳动的性质变得模棱两可了起来，并更倾向于奴役。丈夫和孩子通过爱的参与和爱的勒索成了第

一批工头，成了家务劳动的直接控制者。

丈夫总是边看报纸边等着妻子准备好晚餐，甚至当妻子跟他一起外出上班时也是如此。显然，以家务劳动为代表的这种形式特殊的剥削需要采取形式同样特殊的斗争，即在家里开展妇女斗争。

这种家庭模式才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家庭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且随着工厂里阶级斗争的阶段而变化，那我们的革命将步履维艰，不断延续并加剧阶级斗争的基本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换言之，我们将继续错误地认为我们自己只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工人阶级。只要有人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时时刻刻都将受到阻碍、遭受失败，难以充分地展开行动。在此我们不就其展开讨论。然而，为了揭示并谴责家务劳动作为一种被掩盖的生产劳动，这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妇女斗争目标和形式的问题。

## 孤立劳动者斗争的社会化

事实上，妇女紧接着便会提出相关要求，即“付我们做家务的工资”，鉴于意大利目前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令我们看起来好像打算进一步确定制度化奴役的风险，制度化了的奴役是伴随家务劳动而生的，因此在实践中支付家务工资的要求很难成为一种动员目标。<sup>[21]</sup>

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发展阶级斗争的形式，不要让家庭主妇安静地待在家里，等着发放无法偿付其劳动的工资，最少也得让她们做好准备上街参加示威游行；我们必须发掘各种斗争形式，立即打破家务劳动的整个结构，彻底拒绝做家务，拒绝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拒绝让家变成贫民窟，因为问题不仅仅在于不做家务，而是要彻底粉碎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如何提高做家务的效率，而应该是在斗争中找到主角的位置，不是更高的家务劳



动生产力，而是更高的斗争颠覆性。

要立即颠覆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无需每天都花时间熨烫床单和窗帘，无需不断地清洁地板直到反光为止，也无需每天拂去灰尘。但是还有很多妇女一直在做这些。显然不是因为她们傻：我们再次联想到上文中提到过的与低能学校的相似性。事实上，只有在家务劳动中他们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因为如前所述，资本已将女性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隔离了出来。

但不能因此自动认为与社会化生产隔离等同于与社会化斗争隔离：然而，斗争需要占用做家务的时间，同时也赋予了妇女另一重身份，此前妇女只能在像贫民窟一样的家里获得其身份。在斗争的社会性中，妇女发现并行使权力，有效地获得了新身份。新身份正是也只能是一种社会权力新的大小程度。

妇女进行社会斗争的可能性来自于家务劳动的社会生产性特征。尽管目前家庭服务实际上属于妇女的职责，但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家里的社会服务让妇女的角色更具有社会生产性。但是资本可以通过技术改善工作环境。尽管资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愿意这么

做，但是至少在意大利，资本摧毁了家庭主妇作为核心家庭支点的地位。因此，我们期待家务劳动的自动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绝不会实现：核心家庭的延续与家庭服务的自动化是相容的。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资本则不得不摧毁我们所熟知的家庭模式；换言之，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就不得不进行社会化。

但是我们太了解他们口中社会化的含义了：至少是跟巴黎公社相反的！

资本主义的重组可能实现新的飞跃，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在美国和更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了新的飞跃，这都将通过构建一个更能反映资本主义平等性的家庭模式，来摧毁前资本主义的家庭生产关系，通过合作劳动摧毁其统治地位；通过让前资本主义式的不自由的妇女担当其支点，来超越家庭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彻底性”，让家庭在形式上更能反映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功能，即繁衍劳动力。

再回到上文中的讨论：妇女，家庭主妇，是认同家庭的，在做家务时也力臻完美。有句俗语耳熟能详：在家里你总能找点事做。

但她们不会看到家外的世界。家庭主妇的处境属

于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模式，这样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被强加到她们身上，让她们觉得世界、他者和整个工作组织都是难以理解、本质上未知和不可知的；她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丈夫每天出门遇到这些事情，而她们感知这些的方式只能是，作为丈夫身后的影子。

所以当我们提出妇女必须推翻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必须走出家门时，我们的意思是在迈出房门的那一刻，她们必须是心甘情愿摧毁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这样才能与其他妇女联合起来，不仅是作为邻居和朋友，更是作为工作同伴和反对工作的同伴；因此，我们要面对各种困难，打破女性私有化的传统，然后让女性真正地团结起来：团结不是为了抵抗，团结是为了进攻，为了组织斗争。

对抗普遍的劳动形式，要普遍团结。同样地，妇女不能再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面对丈夫和孩子了，换言之，下班回家后用餐时不再当妻子和妈妈。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个领域均以家庭为前提，所以家外的每个斗争场所都为妇女提供了进攻的机会；工厂会议、邻里见面、学生集会，都是妇女斗争的理

想场所，都是妇女得遇见并面对男人的场所，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妇女 vs 男人”，但他们代表的是个人，而非母亲 / 父亲、儿子 / 女儿，在家外，矛盾和挫败感很有可能一触即发，而这本来是资本打算令其在家中爆发的。

## 阶级斗争的新方向

如果妇女在工人集会上要求废除夜班，因为晚上除了睡觉还要做爱，而且如果白天工作白天做爱的话感觉会很不同，那么这就是在与工作的社会组织进行对抗，推动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立权益，对于丈夫和孩子来说，她们不再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妈妈了。

但是在新的干预和对抗中，妇女也表示，她们作为女性的权益并不像她们被告知的那样，与阶级利益相脱节、水火不容。长久以来，各种政治政党，特别是左翼和工会，都决定并限制了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域。做爱以及为了做爱而拒绝上夜班是符合阶级利益的。只要对为什么是妇女而非男性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究，便可明白整个阶级历史。

如果在学生集会上见到自己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他们的同伴也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对于他们来说，你也是一个个体。很多妇女都流

过产，也生过孩子。我们不明白在医学学生的集会上，不管是不是学生，为什么她们首先就不能作为女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我们以医学学生为例事出有因。不仅仅是当底层的病人被当做研究用的小白鼠时，在教室和诊所里，我们也总能看到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尤其是，妇女总是实验的研究对象，也是性蔑视、性虐待以及医生自大的主要受害者。）

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就是妇女运动的爆发表达了女性权益的特殊性，相关利益迄今为止均与资本主义式的家庭切断了联系。必须在全社会开展妇女运动，整个社会正是建立在对妇女权益的压榨之上的，整个阶级剥削都是建立在“妇女剥削”这种特定的“中介”（mediation）之上的。

所以在妇女运动中，我们必须确定存在剥削的各个领域，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发动斗争的过程中重新获得妇女权益的所有特殊性。

每个机遇都不应错过：受驱逐威胁的家庭主妇们可以提出反对，她们家务劳动的应付工资超过了每个月应付的租金。在米兰郊区，很多家庭已经开始以这种形式发动斗争。

使用家用电器令人愉悦，但是对于制造工人来说，制造大量的电器就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用工资是很难买下各种电器的，料想妻子们也得独自使用这些电器；这只能意味着她们得待在家里，只不过现在家的机械化水平更高了而已。幸运的工人，幸运的家庭主妇！

问题是没有集体食堂。我们必须牢记的是，资本首先得让所有工人都开上菲亚特，然后才可能开食堂。

因此，如果社区光有开设集体食堂的想法，而不将其纳入对抗劳动组织和劳动时间的斗争实践的话，则存在出现新飞跃的风险，在共同体的层面上和一些诱人的工作中，其对妇女的控制最为严格，因此很有可能食堂里的午饭非常糟糕。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我们想要的食堂，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游戏中心和托儿所。<sup>[22]</sup> 我们想要食堂，我们也想要托儿所、洗衣机和洗碗机，但是我们也想拥有选择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跟几个朋友在私密的环境里用餐，可以选择花时间陪陪孩子、陪陪老人、照顾病人，可以选择时间和地点。“有时间”的

意思是减少工作。有时间陪孩子、陪老人和照顾病人的意思不是到相应的托管机构里看一下就走。意思是我们这批首先被排除在外的人在斗争里应起带头作用，这样其他那些也被排除在外的人，即孩子、老人和病人，才可重新获得社会财富；重新与我们联合起来，我们也和男性联合起来，这一次不再是作为附庸而是自主地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被排除在直接的社会生产之外，排除在社会存在之外，而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



## 拒绝工作

我们拒绝接受“家务劳动”成为妇女专属的工作，凌驾于我们之上。家务不是我们的发明，我们也从未得到过补偿，他们却强迫我们每天干十二至十三个小时的家务，强迫我们待在家里。

我们必须走出家门，必须拒绝家庭，因为我们要同其他妇女团结起来，一同与所有认为妇女必须待在家里的情境做斗争，不管身在何处，是托儿所、学校、医院、养老院还是收容所，我们将同所有的妇女一起斗争。走出家门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因为我们在家中提供的社会服务无法在其他场合提供，因此所有在外工作的人便提出要求，干脆放弃一直肩负至今的重担，扔回到本应承担这一重担的资本的肩上。斗争引发的改变越激烈，妇女们就会越发加抗拒家务劳动，妇女们也会更激烈、更决绝，斗争规模就会更大。

工人阶级的家庭更难破裂，因为家庭支撑着工

人，工人支撑着资本。家庭支撑着阶级，是阶级赖以维系的基础，尽管这是阶级牺牲妇女本身为代价的。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就像工会一样，家庭保护工人，但也确保了工人不论男女只能是工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妇女对家庭展开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看一看其他在家里或家外工作的妇女，有助于我们找到其他的斗争机会。只要我们的斗争针对的是工作，这种斗争便蕴含在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工作展开的斗争之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家务劳动对妇女进行剥削的历史仍然具有特殊性，这与核心家庭的存续息息相关。妇女斗争的具体过程是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建立起来的核心家庭。这为阶级斗争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 B. 被动性的生产力

然而，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隐形的、无工资的社会服务提供者。如我们在开篇中所述，将妇女囚禁在单一的补充性功能中，并在核心家庭中使其服从于男性，都是以妇女缓慢发展的身体完整性为前提的。在意大利，天主教认为女性低人一等，因此女性被迫在婚前实行禁欲，婚后也处于性欲被压抑的状态，性生活只是用来繁衍子嗣，强迫妇女生孩子。因此形成了“英雄母亲和幸福妻子”的女性形象，女性的身份成了一种纯粹的升华，论其功能，女性本质上也只是他人情绪的接受者，家庭对抗的缓冲者。女性性冷淡必须重新定义为性功能中被迫的被动接受性。

如今，家庭主妇的被动性本身也具有“生产性”。首先，被动性把女性变成了男性在家外遭受压迫的发泄口，变成了男性渴望行使权力的对象，这种权力是

在资本主义工作组织支配性的灌输下形成的。就此意义而言，女性对于资本主义本身也具有生产性；她成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其次，女性之所以具有生产性，是因为对其个人自主性的彻底否认，强迫她们将挫败高尚化成一系列以家庭为中心的需求。这是一种与家务劳动完美主义强迫症类似的消费。显然，不需要我们去告诉妇女她们的家里需要什么。没人能定义其他人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组织斗争。通过斗争，“高尚化”变得不再必要。

## 死亡劳动和性的痛苦

我们建议使用“高尚化”这个词。单调琐碎家务导致的挫败感与性被动导致的挫败感实为一体。性创造力和劳动创造力这两个领域，都是出于人类需求，我们无需对“相互影响的先天和后天活动”加以界定的领域。<sup>[23]</sup>对于妇女而言（也对于男性而言），先天和后天的权力同时受到抑制。女性被动的、被插入的性强行创造出了爱整洁的家庭主妇，反而令单一的组流水线工作显得轻松了。大多数家务和规训都是琐碎的，需要每天、每周、每年重复相同的工作，每逢假日还需加倍，这杜绝了不受约束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小时候我们即为受苦受难做好了准备：我们接受的教导是要在洁白无瑕的床单上透过干净的性行为获得幸福；同时牺牲性和其他创造性的活动。

到目前为止，透过摧毁阴道高潮的谬见，妇女运动令人瞩目地揭示了男性严格界定并限制女性性潜

力的生理机制。如今我们可以开始将性同创造力的其他方面重新整合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探寻性是如何受到限制的，直到我们从事的工作不再残害我们，不再损害我们的个人能力，直到我们的性同伴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不再受其工作的残害。要想驳倒阴道谬见，就要主张与卑躬屈膝和自我高尚化相对立的女性自主性。但是并不只有阴蒂与阴道之间是对立的。两者还与子宫对立。阴道要么是繁衍劳动力并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的道路（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要么是我们自然权力和“社会设施”（social equipment）的一部分。在所有的表达中，性毕竟是最具社会性的，是人类最深层次的交流。在这层意义上，性就是自主性的消解。工人阶级以阶级的形式超越了作为阶级的自己；在阶级内部，我们自主地进行组织，奠定超越自主性的基础。

## 针对妇女的“政治”攻击

但是当我们在斗争中寻找成为自我和进行自我组织的方式时，甚至当我们发起运动时，我们发现需要面对的是那些极其渴望对妇女展开攻击的人。他们认为，在妇女通过工作和消费保护自己免遭消灭的过程中，她们应对阶级的不团结负责。以下是一份关于妇女指控的不完全清单。他们认为：

1、她想要丈夫花更多的工资为自己和孩子购买新衣，这是建立在她认为自己和孩子应该穿什么的基础上的，而非丈夫认为她需要什么。他为了赚钱努力工作。而她却只要求分配他们本就不多的财富，而不是帮助丈夫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工资；

2、她与比自己更具吸引力的女人展开竞争，她想拥有更多的东西，想让自己的家比邻居的家

更干净整洁。她们本应该以阶级为基础进行联合的，但事实上却没有；

3、她整日待在家里，拒绝了解男人在生产线上的斗争。当男人参加罢工时，她们甚至怨声载道，而不是提供支持。她们支持保守派。

有些人认为妇女是反动落后的，上述便是他们的理由，甚至那些领导工厂斗争的男性、那些参与过激进行动、看起来本应最能理解社会雇主本质的人也这么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很容易以自己的标准谴责妇女的落后，因为这正是整个社会盛行的意识形态。他们不会说他们从妇女的从属地位中获得了多少好处，不会说打出生起便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受到了照顾，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着妈妈、姐妹和女儿的照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难将天生的男性至上同男性的攻击区分开来，后者看起来非常具有“政治性”，只为阶级利益而进行攻击。

我们将做进一步的讨论。



## 1. 作为消费者的妇女

妇女没有把家变成消费中心。消费是劳动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妇女拒绝购物（即消费），那便等同于罢工。然而，话虽如此，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因为妇女不能从事社会组织的劳动，被剥夺了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她们总是试图通过购物来进行补偿。关于妇女购物是否属于琐碎的消费，取决于判定者的观点和性别。知识分子买书，但没人认为买书是琐碎消费。书籍除了具有内容的有效性外，在当今社会还代表男性的价值，依靠的是一种比资本主义还古老的传统。

我们已经说过，妇女为家添置物品是因为家是唯一能证明她们存在的东西。但是，那种认为节俭消费即解放的观点跟资本主义一样古老，提出这种观点的正是那些总将工人处境归咎于工人自己的资本家们。一直以来，持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告诉

哈莱姆（Harlem）<sup>[24]</sup>的，只要黑人男性不开凯迪拉克（直到财务公司将车收回），种族问题便可得到解决。直到斗争的暴力（这是唯一适合的回应）产生了一种社会权力，凯迪拉克只不过是少数几种向人们展示潜在权力的途径之一。是这个而非“实践经济学”给自由主义者们带来了痛苦。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自由的话，就不需要买任何东西了。不需要买他们用以毒害我们的食物，不需要买那些通过阶级、性别和世代来辨识我们的衣服，也不需要买他们用以禁锢我们的房子。无论如何，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得到的永远不够，而不是我们得到的太多了。女性对男性施加的压力是在捍卫工资，而非攻击。正因为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男性才将工资分成自己开销和一般家庭支出两部分。如果妇女不提出要求，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整个家庭的生活标准将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先牺牲妇女的需求。<sup>[25]</sup>因此，除非妇女提出要求，家庭才能对资本发挥作用，在另一个意义上才能对所列对象发挥作用：可以应付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因此，妇女提出要求是保证阶级生活水平最为持续性的物质方式。到了参加政治集会

的时候，她们需要的钱会更多！

## 2. 作为竞争对手的妇女

至于妇女之间的“竞争状态”，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已经就第三世界进行了澄清，只有种族主义才能避免（这种竞争状态）普适于阶级。他认为被殖民者如果不组织起来对抗压迫者的话，便会互相攻击。女性面对更多的消费倍感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不时地以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如上所述这是为了保证阶级的生活水平。这种竞争不同于女性的求偶竞争；是根植于女性对男性的经济和社会依赖性之上的。只要女性还得为男性而活、为男性而穿、为男性而工作，男性就可通过这种竞争对她们进行操纵。<sup>[26]</sup>

至于在家中的敌对竞争，妇女自打出生起便接受训练，着迷于整洁的家，并想拥有它。但是男性无法鱼和熊掌兼得；他们不能一边享受拥有私人奴仆的特权，一边抱怨私有化（给他们）的（不利）影响。如果他们继续抱怨，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他们对女性

敌对竞争的抨击实际上是对女性奴役感到了抱歉。如果法农的说法不对，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不是组织水平低下的表现，那么对敌对便是他们先天无能的标志。当我们将家称之为贫民窟时，家即成了受到间接支配的殖民地。要解决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对抗，就要自发展开斗争。妇女已经克服了比竞争更大的障碍，团结一致，支持男性斗争。妇女们还不够成功的地方在于，尚未制造机会、提出要求，改变并深化斗争的契机。自发斗争彻底改变了整个问题：不再是“妇女将团结一致支持男性”，而是“男性将团结一致支持妇女”。

### 3. 引起分裂的妇女

之前是什么阻止了妇女参与政治？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妇女被利用来反对罢工？换言之，为什么整个工人阶级没有联合起来？从本文一开始，我们便开始关注妇女被排除在社会化生产之外的这一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客观性质：在工厂里一起劳动，在家里孤立劳动。这也主观上反映在了工厂工人独立于共同体的组织方式中。共同体要做什么？妇女要做什么？是支持吗？在家里和斗争中都作男性的附庸？甚至成立一个妇女的辅助工会？这一分裂以及这种分裂充斥于整个阶级的历史中。在斗争的每个阶段，只要位于生产周期中心的人忽视了最外围的人，后者便会对前者展开斗争。这便是工会的历史，比如在美国，当黑人工人被当做罢工破坏者时（从来不是白人工人被引导而相信的那样），跟妇女一样是，黑人会容易被立即辨别，关于破坏罢工的报道更加强了这一

源于客观分裂的偏见：白人能在组装线上工作，黑人只能在旁边打扫卫生；男人能在组装线上工作，女人只能在家里打扫卫生。

当男人拒绝工作时，他会觉得自己富有战斗性，当女人拒绝工作时，同样一批男人却觉得她们挑三拣四。矛盾的是，当一些女性因为被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而投票支持保守派时，男性会觉得她们十分落后；但同时那些男性投票支持的政党，从来不考虑女性的存在，认为她们只是起稳定作用，这些政党照样会出卖他们（以及我们所有人）。

## C. 规训的生产力

如上文中所述，由于被贴上了人格发展缓慢的标签，不管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心理方面，妇女都成了一个压抑性的形象，成了所有家庭成员的规训者。这是妇女在家庭中扮演角色的第三个方面。当一个女性的整个存在拒斥了这种理想角色时，她们的生活便陷入了丈夫和家庭的暴政之中，以及努力成为“英雄母亲和幸福妻子”的暴政之中。那些受到暴政欺压且缺乏权力的人，在下一代还小的时候便与之生活在一起，结果就是培养出了顺从的工人和小暴君。这种方式跟学校老师别无二致。（在这件事上，丈夫是支持妻子的：家长与教师的结盟绝非偶然。）妇女负责繁衍劳动力，一方面负责规训将来成为工人的孩子，另一方面负责规训外出工作的丈夫，因为只有他的工资才能支付繁衍劳动力所需的费用。

在此我们仅尝试讨论了女性的家庭生产力，并未



就其心理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其中虽然遇到了有关妇女扮演角色的各种复杂情形（此外，换言之，家务劳动实际上就是她们在无薪情况下承担的重担），但至少我们已经找到并从本质出发对女性的家庭生产力进行了概括。因此，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摧毁将妇女与彼此、与男性、与孩子分裂开来的角色，每个禁锢于家庭之中的妇女都如家蚕一般“作茧自缚”，死后将丝茧留给资本。正如上文中所述，拒绝所有这一切对于家庭主妇们来说意味着将自己看成阶级的一部分。虽然她们因为没有工资，是阶级的最底层。

家庭主妇在整个妇女斗争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她们破坏了支撑家庭——这一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关键支柱。

所以只要是倾向于肯定妇女的个性、否定妇女只是起补充作用的家庭主妇，相关目标都是值得提出的，都是对角色延续和生产力具有颠覆性的。

就同样的意义而言，所有有助于恢复妇女基本身体功能完整性的要求，都是最迫切的，其中性要求首当其冲，因为从一开始资本便剥夺了性和生产创造力。

难怪有关生育控制的研究进展缓慢，难怪几乎在世界各地堕胎都是被禁止的，除非是出于“治疗”的目的。

要想推进相关要求，不能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资本主义管控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歧视工人阶级，尤其是妇女。

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妇女、第三世界的妇女在研究中被当作实验对象呢？为什么生育控制依然属于妇女问题？若想展开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对相关问题的管控，就需要在阶级基础上行动，特别是女性基础。若想将这些斗争同将母亲看成是妇女专有责任的斗争联系起来，同将家务劳动看成是妇女工作的斗争联系起来，最终抵抗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妇女解放模式——这些模式不过是拙劣地复制了男性角色——就需要与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展开斗争。

## 妇女与拒绝工作的斗争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孤立的家庭主妇身后隐藏着社会劳动，必须摧毁家庭主妇这一角色。但是我们的替代方案是经过严格界定的。有些人认为妇女因为孤立得依靠他人的工资，因此她们也为他人意识所影响，关于女性无法胜任相关工作的谬见便根植于此，迄今为止，只有一项行动曾经摧毁过这一谬见：妇女领到工资，个人经济不再依赖他人，独立的经历与家外的世界发生联系，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办公室的社会化结构中，妇女均可参与社会劳动，并以自己的形式和阶级的传统形式展开社会反抗。妇女运动的诞生是拒绝采用这一替代方案的结果。

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拒绝接受女性的传统地位，这为发起运动提供了动力，资本本身也利用这一动力对劳动力进行了重组，增加了女性的数量。妇女运动只能在反对中开展。正因为出现了妇女运动，也正因为

在行动中越来越多的妇女发声，运动才提出拒绝接受通过工作实现解放的谬见。

我们已经工作够了。用手或是借助机器，我们已经摘了几十亿吨的棉花，洗了几十亿个的盘子，擦了几十亿间房的地板，打了几十亿的字，调了几十亿次的收音机，洗了几十亿片的尿布。每次他们“让我们加入”一些男性的传统领域，都是为了在新的水平上剥削我们。尽管明知两者不同，在此我们还是得再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同大都市的欠发达地区进行比较，准确地说，将其与大都市的厨房进行比较。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规划是使其“发达”；第三世界除了要忍受目前的痛苦外，还要忍受工业反革命的痛苦。大都市的妇女也面临着同样的“援助”。我们之中有些人已经走出家门开始工作了，她们有的是因为迫不得已，有的是因为其他原因，有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她们对其他女性发出警告：通货膨胀已经让我们深陷于血腥的打字室或流水线了，并且毫无获得拯救的可能。我们必须拒绝他们提供的发展机会。但是，工人阶级的妇女斗争并不是为了重新回到原来的孤立处境，尽管家在周一早上有时还是挺吸

引人的；同样，家庭主妇斗争也不是为了刚脱离家庭的禁锢，又得困在办公桌旁或机器旁，尽管跟第十二层楼公寓里的孤独感相比，外出工作有时还是挺吸引人的。

妇女必须充分发掘自己的各种可能性，既不是补袜子也不是担任远洋船的船长。更好的是，我们可以拥有做这些事的希望，但是这些目前也只能写入资本的历史中。

妇女运动面临的挑战是确定斗争的模式，尽管他们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却一方面避免双重奴役，另一方面避免另一程度的资本主义控制和管制。最终这将成为妇女运动中改良主义和革命政治之间的分割线。

天才女性似乎并不存在。自从妇女与社会过程割裂开来后，天才女性便不可能再出现，我们也看不出妇女可在哪些事情上发挥她们的天赋。如今这样事情终于出现了，那就是斗争。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经说过，每位女性从一出生起便患上了“阴茎嫉妒”。但他忘了补充说，当她已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阴茎意味着拥有权力，

那一刻这种嫉妒感开始了。弗洛伊德更加没有意识到，当男女之间的分离产生了资本主义式的劳动分工时，传统的阴茎权力便开始了全新的历史。

而这便是我们可以开始斗争的地方。

马 新 译

王大咪 校



# 妇女的位置

谢尔玛·詹姆斯

A Woman's Place

Selma James





与以往相比，如今的报纸、杂志充满了与妇女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在谈论社交妇女的日常生活或上流社会中哪些人将要结婚的消息；有的在探讨如今的高离婚率并试图解释其产生原因；有的则在讨论数百万进入工厂工作的妇女或是那些焦躁不安的家庭妇女。但所有这些文章从不分析产生这种焦躁不安的深层意义，他们只想让女人们觉得自己过得比以前好，他们恳求妇女开心点。

没有一篇文章指出如果妇女在任何方面比以前过的更好的话，这也是他们自己争取的结果。它们从不指明妇女现在渴望改变，而且将来可以实现这些改变。

这些作者从不描述数百万妇女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否认妇女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

妇女的日常生活表达着她们的意愿——她们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这些文章的很多作者都是妇女，但在这个国家，职业妇女与女工人和家庭主妇不同。这些作者意识到，如果他们报道了这种不同，妇女将以此为武器，为自己和家人争取新生活。

因此他们从不谈论妇女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压力。妇女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些压力时，逐渐觉醒，意识到自身及其他妇女的力量。她们试图摆脱过去与丈夫的相处模式，准备用新的、更好的相处方式替代。以上种种，都是如今作者不愿提及的。

这本小册子的合著者在她们的生活、他们认识的妇女的生活中发现了这点。她们打算写下这些文字，作为展现普通妇女所思所感的序章。

## 单身妇女

许多妇女结婚之前都有工作，而且她们发现能照顾好自己。与二十年前的单身妇女相比，如今的未婚妇女非常独立，她们想结婚但想要不同以往的婚姻。她们说，她们并不想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成为家庭苦力。一个朋友说，她和她的母亲不一样，她想从婚姻中得到更多。“她从没期望过，但我不一样，我有期望。”

妇女想要参与决策，不想为可怜的工资挣扎。结婚后，她们愿意继续工作，即使只工作一阵子，这样至少可以买点自己想要和需要的东西。

除了考虑怎么养活自己，年轻的单身妇女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严峻问题——那些曾被灌输的道德标准怎么办？在思考如何对待旧的道德标准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单身妇女开始排斥昔日被灌输以安身立命的旧道德观念，逐渐建立新的道德标准。此前多年，

妇女只能偷偷与男人交往，而今许多妇女婚前多少都有过情史，但不会被看成是堕落的坏女人。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的朋友都跟男友发生过关系，甚至公开谈论。她们觉得自己有权这么做，她们还想反抗学校权威、反抗父母，甚至反抗那些不接受她们的人。无论社会是否允许，她们正做着和周围朋友一样的事，也支持那些做着一样事情的同类。

“喂，你们吓到我了！”

有位单身妇女曾两度想放弃自由，选择结婚。婚前，只要高兴，她随时都能出门，想买衣服就买衣服。虽然不能像男人一样自由，但至少可以自主安排。一位跟我一起工作的二十岁女孩说，有两次差点就结婚了，她说幸亏没这么做。她告诉我：“听那些已婚妇女谈论她们丈夫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人生活有多好。至少我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有次和已婚妇女闲聊时，她说：“喂，你们吓到我了！我以后宁愿当个老处女！”

但所有妇女都想有家、有家人。上文提到得这个女孩总是不停谈论她男友，以及多想要个孩子。如今年轻妇女认为，婚前与男友共有的甜蜜时光不该随着婚姻消散，反而更应该让婚姻美满才是。显然，这些女孩们并不拒绝异性或婚姻，她们只是拒绝现在的这种婚姻。

## 已婚妇女

一旦结婚，妇女就必须安顿下来，承担相应责任——这些一直是妇女被训练要去做的事。她开始意识到，必须收拾与丈夫共居的房子，必须整理用来招呼朋友、每日休憩的房子。就算有工作，大众也会觉得女人的工作就是整洁房子，赚钱则是男人的事儿。丈夫出去工作养你、养孩子，你只要负责收拾干净房子，照顾好小孩，准备好饭菜，洗好衣服等等。这看起来挺公平的，但很快你就发现宅在家里，收拾房子这种事，跟电影里描绘得完全不一样。家务事既单调又繁琐，永远都做不完。待家里做一段时间诸如熨衣服、早起做饭之类的家务活后，你发现你根本不想干这些，却又不得不做。

## 孩 子

一些夫妇一开始会试着分担家务。比如，妻子在外工作时，丈夫回家后就帮着做点家务。在有孩子之前，有位妇女的丈夫干得家务比她还多。

但一旦有了孩子，任何关于分担家务的想法都会烟消云散。有了孩子后，自然就会变得男主外女主内，即使这种分配方法并不人道。照顾孩子、收拾屋子等等一切事情都变得是女人的事。女人一旦辞职生孩子，男人就不觉得自己该帮忙做任何事。他们刚结婚时的分工，现在成了一条裂缝。孩子不仅无助于他们重修旧好，反而还把妇女更加紧紧地束缚在家中，把男性推向工作，这都加深了裂痕。当妇女为生孩子辞职后，几乎再无可能外出工作。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孩子将妇女禁锢在家中。一两个月后，她就会被禁止工作了。



## 分裂的家庭

妇女的一生都围着孩子转，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孩子，她觉得孩子是唯一真正需要她的人。如果什么都没有了，她就为孩子活。她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时间，这样才能给孩子最好的照顾，从她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她的时间不是自己的，而是孩子的。她必须住在对孩子而言足够宽敞、安全的房子里。有时候，为了争取给孩子提供他们需要、而丈夫又不愿给的东西时，她甚至不得不跟自己的丈夫争吵。总之，她根据孩子们的年龄计划自己的人生。

男人嘴上说“这是我的孩子”总是很简单，但孩子吃喝拉撒，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往往都是女人做。小孩鞋子是否合脚，他们的衣服放哪儿，这些事情男人们一无所知。并不是说，男人们喜欢这样，而是就算他们真想关心，能做的也很少。他们早上上班的时候，孩子们还在睡觉，夜里回家，孩子们又马上要上床睡

觉了。他们一辈子都扑在谋生和相关的问题上。跟孩子们相处时间不够，所以对孩子不管是生理需求，亦或安全感等心理需求都知之甚少。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分工导致父亲与孩子的疏远。很明显，当父母分开生活时，孩子们也会受影响，他们被父母当成对付彼此的武器。孩子们不知道该站在哪儿边，只想尽快逃离这一切。他们拒绝卷入无止境的家庭战争中，只要年纪一到，就想脱离这一切。

## 房 子

家庭主妇每一件事都独自完成，家里所有的活都由她一人完成。只有他人来访时，才有点间与别人接触。人们有时认为女人串门纯粹是浪费时间，但要是宅在家中，她们又会因为没人聊天而无聊到发疯，他们觉得出门与人接触很棒。“就算你死了，房子还是一直在。”有时候你真的太无聊了，必须做点什么消遣。有的女人为摆脱无聊，就曾每两周换一次家具；也有的选择给自己或家里买新东西。白天的广播剧也有助于消磨时光，无数方法都能打破这种单调，但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这种孤单和无聊。

其他家庭成员不属于这座房子，他们只是住在这。你收拾干净房子供他们休憩，让房子变得舒适可居，让房子变得干净迷人，但却是唯一一个永远无法完全享受这一切的人。你跟在家人后头，眼睛永远都在挑剔哪儿还必须整理，永无止境地工作着。在这所

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房子里，却永远都得不到放松。

虽然在很多琐碎的事情上，女人们有权决定，但事关房子的重要事情时，大多数妇女甚至无法真正做决定。真正重大的事情要么由丈夫做决定，要么要保证丈夫的心情优先得到考虑。女人们觉得在家里她们必须要有发言权，她们比以往更多的投入到家庭决策中，却不得不经历长期抗争才能得到这样的认可。

## 她们过着分开的生活

女人整日独自在家。她等着丈夫回家，告诉他今天家里发生的一切——有时候聊孩子们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或说了什么了不起的话，有时候说今天自己过得多不容易。她想听他说今天过得如何，也想听他说说给家里添点这个或那个东西的看法。但他的生活并非围绕这个房子。男人下班回家，他就什么都不想做，有时甚至连话都不想说。你一整天都在等着一个能跟你说话的人，然而你丈夫回家的时候，他所做的不过拿起报纸，好像你甚至不存在。女人如果整日在家，周日下午就想出去走走。但你丈夫每天工作完回家都筋疲力尽，有时周末只想呆家里好好休息。大多数工作日，他都不在家里，周末正好是他在家放松的好机会。女人喜欢有伴儿，也能理解男人根本不了解这一点。如果夫妻间对彼此工作和生活需求无法互相理解，那么这么多婚姻不能熬过七年之痒也就不那么

让人惊讶了。丈夫本该是她们最亲近的人，却常常是最陌生的。他们仅仅过着分开的生活。

## 女人了解女人

在丈夫们那找不到安慰，女人就找其他女人。女人的生活过于相似，很容易彼此理解。住在同一小区、同一街道的女人很容易彼此亲近，一旦遇到困难，她们会互相帮助，也顺带消磨时间。就算丈夫愿意听，她们也想都不敢想跟丈夫说的话，跟这些街坊邻居却能畅快大聊。她们会跟周围女邻居说，想装修房子，想给孩子买点东西，像经济或是与丈夫相处的问题，更是常常谈起。而这些事情她们都不会跟丈夫说。她们谈论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要不要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怎么买东西省钱，哪家商店更实惠，怎么避孕最有效，性和工作问题。在闲聊中，很多事情就都解决了。受到其他女人的影响，女人们对生活有了新态度。如果一个女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其他人就会排挤她。一个妈妈如果毫无理由地没照顾好孩子、不收拾房子，她就得不到其他妇女的信赖。

有些人称女人们的闲聊为八卦，但这不止是八卦。妇女通过与其他妇女的紧密联系摆脱家庭生活的桎梏，这是家庭妇女能有的唯一的、付出最多的集体生活。这类与其他家庭妇女强烈的联系是妇女对她的丈夫、生活以及社会的谴责。女人们一起聚会，一起聊天，同时也以某种方式生活在一起，除了她们自己，没人可以帮助她们。在这样的聚会中，没人会妨碍她们，她们可以自由决定跟谁一起，干什么，去哪儿。

周五是我每周最开心的日子。因为想在周末少干点活，每个人在周五就清洁了房子。下午收拾好房子后，有的人会出门喝杯啤酒。我们聚在一起聊天放松、交流想法。跟这些懂你并接受你的人在一起，能体会到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无法体会的亲密。

女人们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通过分享处理事情的经验 and 圈子中的其他妇女的帮助，他们懂得了如何在需要的时候采取行动。为遏止不断上涨的物价，旧金山一项安居工程的女人们聚在了一起。她们觉得政府无所作为，于是决定亲自出马。在无人组织的情况下，自己召开会议、发动示威，还分发传单。共同生



活这么久之后，她们对彼此优缺点了如指掌。这些女人把所有商店里的标价都列出来，而且只在售价最低的商店买东西。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全城都知道了“Mama’s OPA”。<sup>[27]</sup>

很多时候，媒体并不报道家庭妇女的行动。为了让孩子有空地玩耍，妈妈们会在街上设路障，就算警察扔催泪弹也赶不走。在某些特定的日子，女人们会互相传话提醒大家别去买肉。她们会突然走向陌生女人，说“今天别买肉了”。女人对彼此太了解了，所以才敢跟完全陌生的女人说话，相信能被理解。矿工的妻子走上街头，反对大公司买卖她们的房子，抗议矿业城镇的空气污染。丈夫全力支持她们的抗议，却不愿跨过警戒线。

尽管每个人的境遇不同，但大体上她们都过着相似的生活，被对待的方式也都是类似的，也因此才能像一个团体一样行动。

## 新的关系

女人们普遍是在家里集中起来，她们在自己家中革命。一些妇女虽然跟丈夫话不多，也不常和其他女人聊天，但一到紧要关头，却能马上行动起来。有些妇女会跟丈夫争论要求获得应得的，这种争论对妇女而言很有意义。她并不只是在与丈夫拌嘴，通过争论，她告诉丈夫，更重要的是告诉自己，她们是有想法的。女人们用各种方法不断告诉男人，她们不想再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尽管会直接冒犯男人，但男人也欣赏这种独立自主的妇女。他们不喜欢围着自己的妻子团团转。独立的妇女不仅会得到其他妇女的尊重，她们的丈夫也会因此尊重她们。妇女越来越不愿意成为照顾孩子和丈夫的机器，她们希望在婚姻中丈夫能给与别的更多的东西。如果丈夫不愿改变，她们不会得过且过，会选择离婚。现在离婚越来越被接受，这是女人们努力的结果。许多女人离婚都是因为

男人们不愿改变。表面上，女人离婚常常是因为某一位男人的问题，但实质上这却是女人反抗今天男女相处模式的一种整体表现。女人不满男人在家庭中的角色，这跟男人干了多少家务，对孩子多好，多竭力了解妻子的烦恼，跟妻子关系多好等等，跟这些都没关系。女人是在反抗强加于她们的生活方式，她们想创造新的生活。

## 职业妇女

工作，是妇女反抗被强加的社会角色的一种方式。现如今在外工作的妇女此前根本没工作过。通过工作，女人改变了与丈夫、子女的关系，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有了更丰富的经历后，女人知道了更多人的所思所为。家庭主妇越来越少，大多数女人都至少有一次工作经历。有的女人每年只工作几个月，有的则更规律些。无论是哪种情况，她们对世界都有了从未有过的新想法。

曾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些妇女说，她们丈夫的工资不够生活，所以才出来工作，这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那些丈夫工资微薄的家庭。现在这种现象越发普遍。除了生活花费增多，其他一些原因也让一份薪水无法支撑家用。她们不想经历经济萧条时破产的可怕感觉，比起过去，她们想要的更多。她们不想手洗衣

服，付点钱，就可以用更现代的设备。如今所有的东西都现代化了，女人想要用上这些现代机器。

预算拮据的时候，承担一切的都是女人。她不得不走一大段路去买东西，也总是第一个放弃自己所需的。

经济独立是女人管理财务时最大的需求。她们不想每花一笔钱都要提前跟丈夫报备，她们想有自己的钱。虽然窗帘还是好好的，但你就是腻了，想有钱买个新窗帘，这很奢侈，很多女人都买不起，但所有女人都想买。虽然你跟你丈夫一样辛勤，虽然手里拿着支付家庭费用的工资，但丈夫给你的这些钱从不是你的。仅男人一份工资根本无法满足女人的需求。

待在家里的无聊和孤单也是促使女人出去工作的另一个原因。女人想多跟其他人接触。与她们的丈夫相比，女人在家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电话和收音机是家中唯一陪伴她们的东西。在工厂，你至少可以与他人一起工作，可以远离家庭生活的无聊和孤单。

女人出去工作最后悔的莫过于离开自己的孩子。你的确很想走开一会，但也不想把孩子随便扔给一个

人。大多数时候，你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照顾好，等孩子长大了一点，你又担心他们的伙伴是谁、在一起都干了什么。孩子在幼儿园，你要是询问他们的表现，大部分时候老师都说，“挺好的”，仅此而已。你完全不知道学校是怎么对待孩子的。你总是想孩子们乖乖的，但一旦工作，你就什么都不确定了。

另一个问题是，你工作时，孩子要放在那儿？许多有孩子并且跟孩丈夫分开妇女，不得不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她们很想念不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她们对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没有关心。一些妇女对幼儿园的情况一无所知，因而更喜欢把孩子寄放在邻居家。另一些因为找不到可信赖的人照顾孩子，所以完全不工作，自己照顾孩子。

## 所有事情都将由我们做主

妇女夜里下班回家后的情况跟男性下班回家后的情况完全不同。女人一回家就又要开始工作。已婚妇女，特别是还有孩子的，是永远没法安静坐下休息，什么都不干的。这简直就是奢望。她必须要准备晚饭，洗碗，给孩子洗澡，哄孩子睡觉。她身兼二职，一方面是母亲和主妇，另一方面又是全职上班族。男人周末可以休息，女人却不得不收拾房子。一周堆积的所有家务周末必须做完，这真是折磨人的苦差事。无论你的丈夫多体贴、多想帮你，只要有家庭又同时工作，那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都还是在你。女人在外工作，不代表就不是家庭主妇了。

比起待在家里，有工作的妇女与丈夫更有共同语言。比起从前来，夫妻间也有许多话题可共同讨论。然而主要障碍还是存在。跟其他同性友人聊天仍然比自己丈夫聊天容易。即便如此，毫无疑问夫妻间的

关系还是改变了。破天荒地，妇女可以说，不是你，而是我们在支撑这个家。从此以后，所有事情都将由我们做主。



## 每个女人都知道

如今，越来越多妇女用行动表明她们不愿再被像从前那样对待。从事什么工作，或未来生活会如何，妇女对此并没有太多信心。丈夫、孩子、工作，所有这些都与她们自己的生活冲突着。她们觉得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做得每一个决定都可能起作用。婚姻、家庭、孩子，此后妇女对这些再也不会确定无疑。

从未工作过的家庭主妇等孩子年纪一到，马上跃跃欲试地想找工作；有固定工作的妇女又盼着能早日辞掉工作。结婚二十年的夫妻正准备离婚；结婚六个月的年轻夫妇，为不再折磨自己和后代，在有孩子前，早早选择离婚。年轻妇女毕业后不再急着结婚，而是找工作买房子，独立地生活着。

并不是说妇女不想成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当然想和异性分享自己的生活，也想有个孩子。但她们认为，如果不能有一段人道的夫妻关系，那不如不要。

结婚又离婚，做家庭主妇又再出门工作，妇女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却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除非有彻底改变，否则妇女仍觉得找不到出路。但有一点无疑是肯定的——事情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了。这一点，每个妇女都知道。

Orpheus 译



## 初版前言

这两篇文章写成的时间相距十九年，跨越了七千英里的距离。

第一份文件《妇女与社会翻转》是意大利新妇女运动的产物，是对日益高涨的国际妇女运动提出的问题所做的重大贡献：妇女与资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有效地摧毁它呢？必须补充的是，这和下面这一问题不一样：我们可以从敌人那里获得什么样的让步？——虽然这也是和前者有所关联的。提出第一个问题，是假设我们会胜利；提出第二个，则是计算我们可以从失败的残骸中拯救出什么。努力争取胜利的同时，我们也能在其过程中有丰富的收获。

到目前为止，在界定自己时，关于妇女与发达及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妇女运动无法从中得到的任何正统思想的帮助。恰恰相反，我们继承了一种歪曲的和改良主义的概念，把

资本本身当作我们努力规划、控制或管理的一系列事务，而不是一种应当努力消灭的社会关系。<sup>[28]</sup> 不管绕过正统还是缺乏正统，从我们亲自了解的那些开始，我们的运动探索了女性经验。我们第一次大规模地以深刻的洞察力，精确描述了妇女的退化，以及对我们的个性的强迫性塑造：它旨在使我们接受这种退化，接受成为安静和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趋势出现了，它们显然与妇女运动中政治谱系的极端主义相反。

在坚持“种姓”而不是阶级才是基本原则的人中，有些妇女认为所谓的“经济分析”，乃至政治革命斗争，都不能结束对妇女身体和心理的压迫。她们拒绝革命政治斗争。资本是不道德的，需要改革，应该舍弃，他们如是说（这意味着改革是一种道德义务，其本身就是一种经过协商的——更重要的是非暴力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它不是唯一的敌人。我们必须先改变男人和或我们自己。因此，不仅政治斗争被否决了，对大量忙于工作、忙于照料他人，因而无暇去寻求个人解决方案

的妇女予以解放也被否决了。

这些政治未来导向可能会有所不同，主要因为这个观点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具体形式取决于持有该观点的妇女的阶层。这种类型的精英俱乐部可以保持孤立和内向性——这无伤大雅，除了它破坏了整个运动外。它也可以成为统治阶级正在寻找的每个领域的管理类型的来源。它的统治功能涵盖了反抗的妇女和反抗的男人，这也是上帝所庇护的平等原则吧。<sup>[29]</sup>顺便一提，野心和竞争心对参与统治的边缘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而至今它们仍被认为是男人特点。

但历史，过去和未来并不简单。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场运动的一些最深刻的发现以及还有它事实上的自主权，来自于那些拒绝阶级观和阶级斗争的妇女。现在运动的任务是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在这种自治的基础上，制定一种政治战略。

大多数从一开始就坚持阶级而不是“种姓”是根本的人，更不能将我们的心理洞察转化为自主的、革命的政治行动。从男性对阶级给出定义开始，妇女的解放就简化为要求同工同酬和要求一个

“更公平”、效率更高的福利国家。<sup>[30]</sup> 对于这些妇女而言，资本是主要的敌人，但这是因为资本落后，而不是因为资本存在。他们的目的不是摧毁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是更合理地把它组织起来。（意大利议会外左派管这个叫“社会主义”，以便与革命立场区分开来）。配给资本——同工同酬，更多更好的托儿所，更多更好的工作等等——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称之为“压迫”，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托普西（Topsy），一个从来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的奴隶孤儿“刚刚长大”。与物质关系脱离的压迫是“意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伪装成政治术语的心理学。所以“阶级分析”被用来限制这一运动的打击面，甚至还会破坏运动的自主权。

这两种趋势本质上相似的自由主义性质通常不容易看出，它们都想要合理地管理“社会”来消除“压迫”。除非当我们看到“政治”妇女和这些“非政治”妇女在具体要求，或者更多时候在反对革命行动的需要下结合在一起，她们的性质才有所体现。运动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属于这两种倾向，也

很难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两者都问我们：“你是女权主义者，还是一个政治人物？”

谈论阶级的“政治”女性很容易辨认。他们是妇女解放主义者，他们的第一效忠的不是妇女运动，而是男性率领的左派组织。一旦战略和行动来源于妇女以外，妇女的斗争便通过它将如何影响男人——也就是所谓的“工人”——来衡量，妇女的意识则通过采取男人传统上用过的斗争形式来衡量。

“政治”妇女看到我们其他人是非政治性的，这往往使我们在自我保护、模糊或淡化我们之间的真正政治分歧中走到一起。这些分歧如今开始显现。自称为心理学团体的群体（我不是在这里谈论政治意识提高的群体）倾向于以连贯一致的方式表达“种姓”的政治。<sup>[31]</sup>但是无论他们来自于哪一个地区，将女性视为“种姓”，仅仅是“种姓”这种独特的政治话语，在每次讨论中的找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组织表现。在即将到来的激烈的工人阶级活动中，随着我们被迫创造出自己的政治框架，抛弃了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二手理论，“种姓”



过去的优势将成为被取代物，将必须被抵制和拒绝。独立自主的新政治在这个基础上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样的发展过程不是妇女运动所独有的。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黑人运动也开始采取一种似乎只是“种姓”的立场，反对以白人男性为主体的种族主义。哈莱姆的知识分子与伟大的革命家马尔科姆（Malcolm X）都是民族主义者，白人左派仍然称诵“黑人与白人团结作战”的各种版本，或者“黑人与劳工必须联合在一起”时，他们似乎已将肤色置于阶级之上。黑人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这一民族主义来重新定义阶级：黑人和劳工作为一边倒的同义词（没有其他词语和劳工如此同义了，除了妇女），等于说黑人的要求是最全面的工人阶级要求，黑人创造的斗争形式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确实能够吸引到知识分子中最出色的人，在对黑人工人的剥削中，他们将自己视为如同黑人一样受到种姓式的迫害。这些知识分子在理解阶级超越民族主义以后，越来越把种族看作一种个人条件，随后就出现了支持这样政策的一群人：比如，国务院

象征性地任命一个黑人担任总统贫民窟拆迁方面的特别顾问，或者任命一种新的综合技术的专家。

同样，认为“种姓”才是根本问题的妇女，也会把对阶级的重新定义，或将其融入白人男性的权力结构看做过渡到革命女性主义的基础。

但是，正如新奥尔良运动中的女人所说，“‘马克思主义’女性只是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男人们而已。”她们所看到的斗争，与男性化管理下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一直受到妇女的赞扬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现在在“一般斗争”之后，就是所谓的“妇女解放”或者是妇女的斗争，由女性自己去发声罢了。这个“一般斗争”我理解为阶级斗争，但在资本主义里没有什么不是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不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问题在于（a）除了作为工资工人时以外，妇女（如前假设）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从属？因此女性斗争是反资本主义的一种更基本的，更普遍斗争的从属吗？（b）任何排除了这么多女性这么长时间的事情，能够被称为“普遍”吗？一方面，拒绝阶级从属于女性主义，另一方面，拒绝女性主义从属于阶级，玛利亚罗莎·达

拉·科斯特直面我们一直试图探索和解决并（令我们羞愧地）被误认做马克思主义的女性经验。其结果是将心理学见解转化为对妇女剥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革命和妇女自治斗争的理论基础。我们知道退化状况是“怎样的”，那么她更进一步理解到了这样的状况是“为什么”，据我所知她已探索到了无人企及的深度。

\* \* \*

马克思的一个伟大成就是阐明了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人之间的具体社会关系，这是种没有自觉规划的关系，“隐藏在个人背后”（Menschen，以前翻译为男人）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掠夺了劳动力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形式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上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从家庭开始，包括所有其他制度，反映的都是它的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是一个被剥削者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在长时间内不断被激发，突然发生革命性跨越，

改变基本社会生产关系和表达这种关系的所有制度。如此一来，家庭就是基本生物单位，其形式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各有不同，与人们生产的方式直接相关。据马克思所言，即便在阶级社会前，家庭都以从属于它的妇女为枢纽，阶级社会本身就是男人与妇女儿童之间关系的延伸，即男人对妇女和他的子女的劳动指挥权的延伸。

妇女运动更详细地探究了资本主义家庭。在描述了妇女如何习惯于从属男人后，它将家庭描述为一个年轻人从出生时便被压制下来以接受资本主义关系纪律的机构，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以资本主义工作纪律开始的关系纪律。其他妇女将家庭确定为消费中心，另有一些人则表明，家庭主妇组成了一支隐性的储备劳动力：“失业”的妇女在家中关门闭户，当资本的其他地方需要她们时，就会再次被召唤出场。

达拉·科斯特的文章肯定了上述所有的一切，但将它们放在另一个基础原则上：资本主义下的家庭不是调节，消费和储备劳动力的中心，而基本上是社会生产的中心，以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说，

资本主义家庭没有为资本主义而生产，不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他们就否认了妇女的潜在社会力量。或者说，假设家里的妇女不能拥有社会权力，他们便看不到妇女在家里的生产了。如果你的生产真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那你拒绝生产，拒绝工作，就是得到社会权力的根本杠杆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并不是对社会“给个人贴标签”的冥想。它是一种找到推翻它的方式的工具，找到被资本剥削且能颠覆它的社会力量。然而，正是因为他寻找推翻资本的必要力量，他可以描述那些孕育了工人阶级颠覆力量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正是因为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在寻找妇女在这些力量中的杠杆作用，即使在妇女不能在家庭以外工作，她们也能发现自己是重要的生产者。

她们生产的商品，与其他所有商品不同，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活着的人类，即为“劳动者自己”，资本掠夺劳动的特殊方式是向工人支付一份足够用于存活的工资（或多或少）并复制生产其他工作人员。但工人必须以商品的方式生产更多超越他工

资价值的东西。无偿剩余劳动是资本家要积累的，这使他对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拥有不断增长的权力：他付出一些工资，得到劳动，再免费获得剩余劳动，然后他指挥更多的劳动，得到更多的免费劳力，以至于无穷——直到我们阻止他。他以工资的方式购买工人出售的唯一“物品”，他或她的工作能力。那具体的社会关系——资本——就是一种工资关系。这种工资关系只有在工作能力成为可销售商品时才存在。马克思称这种商品为劳动力。<sup>[32]</sup>

这是一种奇怪的商品，因为它不是一样物品。劳动的能力只存在于人中，后者的生命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它首先必须在子宫内进行九个月的哺育，必须穿衣和训练，它的床必须铺好，它的地板要被清扫，它的午餐盒准备好，它的性欲得到满足，当它回到家，即使是早上八点从夜班回来晚餐也必须准备好。这是劳动力在工厂或办公室每天被消费时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描述其基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就是描述妇女的工作。

因此，社区不是工厂的附属地，不是一个自由和休闲的区域，那里碰巧有些作为男人的仆从而退

化的妇女。社区是资本主义组织的另一半，资本主义隐蔽剥削的另一个领域，另一种剩余劳动力的来源。<sup>[33]</sup> 像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所说的，它越来越像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社会工厂，里面的运输，住房，医疗，教育，警察的成本和性质都是斗争的起点！<sup>[34]</sup> 这个社会工厂的核心是，女性作为一种商品在家庭中生产劳动力，她的斗争则是不去生产劳动力。

那么，妇女运动的要求就会具有新的和更颠覆的意义，例如，我们想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身体时，我们正在挑战资本的统治，这种统治将我们的生殖器官，我们的双臂和双腿转化为剩余劳动积累的工具；把我们与男人的关系，与孩子和创造孩子的关系，转化为生产这种积累的工作。

\* \* \*

第二份文件《妇女的位置》来自美国，最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是 1952 年冷战高潮时期在洛杉矶写的，那里年轻的男女工人如同圣经中的人

物那样迁徙而来。<sup>[35]</sup>虽然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但我只是一个媒介，来表达从南方和北方移民至金色西部的妇女、主妇和工厂工人感觉和了解到的东西。

现在已经清楚了，在外工作不会使家庭劳动变得更有吸引力，也不能把我们从分担家务的责任中解放出来。同样清楚的是，若要把人生浪费在在包装巧克力，绕组变压器或给电视装电线，我们也无法忍受。我们拒绝了两者，对抗两者。举例来说，在那些年代，如果一个男人的朋友看到他穿着围裙洗东西是会笑的。如今我们改变了这一事实。

毫无疑问，为这些变化而斗争的勇气直接来自我们的薪酬支票，就算我们如此憎恨为之而工作。但是，尽管我们讨厌这项工作，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在一个孤立的家庭以外，获得独立社会经验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似乎是家庭以外的唯一选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大量受雇进入工业，在那以后，1945年至1947年之间，我们被野蛮地逐出，1947年起，他们再次想要我们，于是我们回来了，随着韩战的爆发（1949年），从事



工业的妇女数量越来越多。基于在小册子中列出的所有原因，我们需要钱，除了获取工作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是从工业，农业或采矿业来的移民，这一点令我们更加依赖薪酬支票，因为我们只有自己。但它也给了我们一个优势。在洛杉矶的新兴飞机和电子工业中，除了妇女的标准工作，例如食品和服装，我们设法实现新的行动自由，而我们中间白人妇女比黑人更多，后者在那些日子里基本被工资较高的工作所拒绝。我们不会受到“留在东边”或“还在南边”的父亲们母亲们的限制。过去几年在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工会来到西岸以后作为谈判代表，每年通过谈判给我们上涨十美分的工资，工会也是我们在装配线上面对的纪律机器的一部分，是在我们看到钱之前，还要为之支付的高额费用。其他传统形式的“政治”组织要么是不存在，要么是不相干的，我们大多数人忽视了这些组织。总之，我们与过去一刀两断。

在六十年代末期的妇女运动中，那些拒绝了旧保护形式或从未认识这些形式的人，终于找到了大

规模的表达能量的途径。然而在二十年前，在与资本（直接和通过男人）的对抗衰退以前，我们摸索出一条抗争之路，它正在成长为一种国际经验。经验告诉我们，“家庭外的第二份工作是另一位老板，叠加在第一份工作之上。女人的第一份工作是再生产他人的劳动力，而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再生产和卖掉她自己。所以她在家庭和工厂里的斗争，她的劳动，她丈夫的劳动，以及她未来子女的劳动，联合起来是一个整体。一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两个方面若能高度统一起来，不仅需要提出新的斗争范围，而且还要对这一斗争中妇女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做出全新的衡量。

这些是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的文章的主题。二十年前，美国所谓“保守派”或“落后者”，或顶多不过是“非政治”家庭主妇和工厂妻子发起了软弱无力的斗争，现在这一切都由意大利的一名妇女记录，并作为重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重新定位斗争的起点。这一理论发展需要和表达出一种全新的斗争水平，这正是国际妇女为之而奋斗的东西。

姐妹们，我们走了太长的路了。

\* \* \*

玛利亚罗莎的文章来自意大利并不意外。首先，在意大利，极少妇女在家庭以外拥有一份工作，家庭主妇的境况似乎是无法撼动的，她从在外工作的邻居那里也得不到多少支持。在这方面，她的情况更接近洛杉矶“女人世界”的女人，而不是今天的女人。故此，意大利的女权运动必须扎根于家庭妇女。

与此同时，今天数百万别处的妇女走出门去工作，通过与新的目标进行斗争，使自身的情况得到了显著缓解，她们创造出的可能性是二十年前的洛杉矶妇女无法想象的：除了工厂和办公室的直接剥削，意大利任何一处的家庭主妇都有别的选择，以便从家庭中脱身。置身于意大利天主教贫民区，女人们似乎被困住了，除非她需要为她而创造的工作。作为国际斗争的一分子，她可以开始拒绝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摆脱资本不发达状态，正如其他妇女正在拒绝的那样，从而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在工

业和第三世界领薪资的妇女，通过拒绝成为家庭妇女或工厂妇女，为全体妇女和她自身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玛利亚罗莎说：“资本本身依赖于同样的动力，用越来越多的妇女重新组建劳动力，而这一动力也创造出一场运动——数百万计的妇女拒绝传统的妇女地位。这场运动只有反对这些才能发展……这将是妇女运动中改革主义与革命政治的分界线。”

到目前为止，需要打破孤立状态和重获自治权的妇女只有在资本主义规划的内部才能找到出路。今天的妇女运动就像是唯一的出路，它将破坏资本主义规划。在英格兰，这场斗争的动力是为无人赡养的母亲争取有保障的收入；在美国，福利母亲<sup>[36]</sup>要求最低生活工资，并拒绝从事国家组织的工作。两国政府对此的反应表明，它们认为这个新运动的基础是多么危险，妇女离开家园不是为了另一份工作，而是为了一条警戒线，为了一次会议，或者为了打破 SS 或福利办公室的窗户，这一切是多么危险。

通过“本质上是一场斗争”的一项国际运动，

妇女薪单的权力可由无薪妇女处置，这使无薪妇女能够认识和运用自己迄今为止隐而未现的权力。这种导向在意大利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另一个层次上，那里的工人阶级有一段独特的斗争史。在二十年代初，他们占领工厂，被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版本打败，然后转入反资本主义的地下武装。（希望如今没有必要补充，这是男人们和女人们共同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妇女在不仅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且能发挥不同的作用 [例如在工厂收购问题上]，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在战后的几年中，来自意大利南部不发达地区的工人移民，这些工资劳动原则下的新生血液，也对它进行了反抗。到了 1969 年，这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就能够发起一场规模庞大的学生运动，并创造一个议会左派，这一切都能看出这段历史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议会外左派没有将妇女作为一股自主力量融入其政治观念，而是以由天主教推动的男性傲慢为主。但是，尽管他们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知识分子式的欧洲左派意识形态，一如他们所设想

的，他们关注的还是阶级，最重要的是，他们推进和参与直接的进攻行动。

被意大利左派打破的欧洲意识形态的主要前提之一，是不仅其中的女性，美国的工人阶级全都是“落后”的。在欧洲左派的眼中，黑人运动是一场与阶级无关的特殊历史事件，这一阶级中权力最高的人，其生活水平是资本的礼赠，而不是艰苦和暴力斗争的结果。即使是白人，只要不是欧洲人就尚未“文明化”。这种种族主义早于奴隶贸易而存在，自 1492 年以来，便与帝国的征服相互依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选择将《妇女的位置》在意大利与自己的文章一同出版，当做二十年前那些被欧洲人和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嘲笑的人的日常革命斗争的表达。达拉·科斯特在美国阶级斗争中看到国际阶级最强大的表现；把阶级看成是国际性的，显然工业界和第三世界都是她的斗争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展开了对“谁是工人阶级”新的分析。它被假定为领薪资的工人，达拉·科斯特却不同意这一点。工薪人士与非工薪人士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中

不可或缺的工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即资本本身。如果这两者是资本结构必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反对一方斗争与反对另一方的斗争应当相互依存。

基于剥削结构的阶级分析和这种结构中的对抗阶段，应该在妇女日常斗争的发展过程中评估它的原因及其影响，而不是通过别人所设想的我们的“政治意识”应该是什么来评估它。

在英国和美国（也许在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妇女运动必须否认白左的拒绝，以便开拓大都市的工厂斗争之外其余领域的斗争。

在意大利，妇女运动在左派和学生运动之外寻找自身的自主生存模式的同时，显然在后两者已涵盖的领域产生了冲突：即如何组织社区领域的斗争。<sup>[37]</sup>

他们为社区的斗争提出的建议事实证明只是一种延伸，一种对工厂斗争的机械投射：男性工人继续是中央主角，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认为社区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家庭，女人是社会颠覆的中心人物。以这种方式看，妇女是所有以往政治框架的矛盾点，这个政治框架是以工业的男性工人为

基础的。<sup>[38]</sup>一旦我们将社区视为一个生产中心，从而将它看作是一个颠覆的中心，普遍斗争和革命组织的整体观念就会重新开放。<sup>[39]</sup>

借助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斗争遗产，这种行动和组织可以从阶级和种姓，并且终于是妇女的运动中发展而来，在天主教会的心脏地带，它必将扩大我们斗争的可能性，不管我们的国际运动发生在哪一个国家。

为了姐妹和阶级的权力。

谢尔玛·詹姆斯

1972年7月27日于帕多瓦

邓宁立 译

张 霏 校



## 注 释

[1] “种姓” (caste) 平常指与印度教有关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借用这个词来描述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最早这样用的大概是美国的罗克珊·邓巴 (Roxanne Dunbar)。在《女性解放作为社会革命的基础》(1969) 中，她把“种姓”定义为“一个基于可辨认的物理特征而形成的社会类别”——与“阶级”“阶层”等其他等级范畴所不同，“这些特征一出生便被赋予，靠自身的力量无法逃离”。——译注(如无特别注明则系原注)

[2] “社会工厂”是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 马克思主义者马里奥·托伦蒂 (Mario Tronti) 等人提出的概念，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定义和用法，但其基本意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越来越把整个社会按照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来重组，把整个社会就像个工厂一样去管理。——译注

[3] 这是 1970 年 8 月美国妇女庆祝国际妇女节时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一部分。

[4]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阐释“教育”的全新意义，义务教育——强迫学习——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英国，教师被认为是“道德警察”，他们可以（a）约束儿童不“犯罪”——避免工人阶级进行社会再占用；（b）摧毁“暴民”，工人阶级以家庭为基础进行组织，家庭仍然是具有生产力的单元，或至少是可行的组织单位；（c）让定时出勤和守时成为习惯，这对于儿童未来的就业来说是必要的；以及（d）通过分级和选择对阶级进行分层。至于家庭本身，其向控制新形式的过渡不甚顺利、是非直接的，这是资本主义历史各个阶段阶级内和资本内矛盾力量作用的结果。

[5]雇佣劳动的基础是所有关系服从于工资关系。工人必须以“个人”的身份签署合同，资本将剥夺亲属关系的保护。

[6]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央编译局译，第245—404页——编注）。

[7]此处我们无意探讨核心家庭狭隘性的问题，即核心家庭阻止孩子进行轻松过渡、与他人建立关系；也无意探讨心理学家由此产生的适当调节可以避免上述危机的观点。我们探讨的是，在社会的整个组织架构中，家庭、学校和工厂都是一种贫民窟化了的区划。所以从一个区划到另一个区划的过程是充满

痛苦的。这种痛苦无法通过修补贫民窟区划之间关系而减轻，只能通过摧毁各个贫民窟而消除。

[8]“免午餐费、免学费、免课本费”是某部分意大利学生运动中众多的口号之一，旨在将年轻学生的斗争与工人和大学生联系起来。

[9]在英国和美国，心理学家艾森克（Hans J. Eysenck）和詹森（Arthur Robert Jensen）认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黑人的“智力”要比白人低，而诸如伊里奇（Ivan Illyich）之类的进步教育家的观点却恰好相反。他们的目标一致，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却不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心理学家都跟其他人一样是种族主义的，只不过心理学家更直接罢了。“智力”是一种从敌人身上发现智慧的能力，是一种在此基础上塑造自身逻辑的能力。如果整个社会都在白人种族优越性的基础上运行相关体制，那么无怪乎这些心理学家会认为通过有意识的彻底“调节”，即使不读书孩子们也不至于去做莫洛托夫燃烧瓶。伊里奇非常关心儿童“成绩不佳”的现象（即儿童拒绝“智力”），他的一个合理观点可以说明问题。

[10] 尽管是资本在管理着学校，但控制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人阶级不断地、越来越多地对学校教育的内容发起挑战，拒绝承担资本主义教育的代价。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应是重新建立

自己的控制权，并在工厂之类的地方进行更严厉的控制。甚至在我们写作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在绞尽脑汁地构思更复杂的教育政策。我们只能在此指出新政策的动力：（a）就算工人阶级青年成了白领，使用打字机和绘图板而不是铆接机，他们拒绝那种培养他们进工厂的教育；（b）中产阶级青年拒绝在阶级间扮演调解员的角色，拒绝当调解必备的压抑人格；（c）更大的工资和地位差异需要新劳动力。目前的平均主义趋势必须扭转；（d）创造新型劳动过程，试着吸引工人“参与进来”而不是拒绝接受现有的单调和碎片化的流水线。如果青年拒绝接受传统的“成功之路”乃至“成功”本身，那么就必须让青年找到新的目标了，这样他们才会去上学、工作。“免费”教育中的新“实验”鼓励儿童参与教育规划，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变得越来越民主。如果这样便认为资本失利了，就是产生错觉了，认为管制将取得胜利也是一样。因为在创造以新颖的方式接受操纵的劳动力的过程中，资本甚至不会损失 0.1% 的利润。

“事实上，”他们会说，“只要还在我们的地盘，你走自己的路，于我们而言其实是更加高效的。”在工厂和社会工厂的某些地方，资本的口号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自由和互助将保证甚至扩大平等”。

[ 11 ] 在 1970 年代意大利的工运、女权等社会运动有关的马

克思主义话语当中，“自主”（autonomy，又译“自治”）指的是工人、妇女、学生等无产群体积极去反对被代表，反对自称代表他们的传统工会、政党等左翼组织，而独立去直接行动（比如进行野猫罢工）。有一部分自主主义者同时又强调，虽然这些群体都属于无产阶级，但不同群体之间还会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因为某些群体（比如来自大城市的中年男性技术工人）往往试图代表、代替或忽略其他群体（比如年轻的农民工、女工、家庭主妇等），所以这些自主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中的不同群体还需要把自己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分析清楚，从而展开自我的直接行动。——译注

[12]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量，也包括个体、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生产方式、各种财产等。  
——译注

[13]此刻我们绝不是忽视为了得到试管婴儿而做出的尝试。但在今天，这样的机制完全属于资本主义式的科学控制。使用试管婴儿将彻底背离我们，背离整个阶级。放弃生育、拱手让给敌人不是我们利益之所在。争取生育自由才是我们利益之所在，我们既不会为工资付出代价，也不会为社会排斥付出代价。

[14]假如不借助技术创新而只用“人文关怀”来抚养孩子，

那么就只能通过妇女运动和妇女斗争来有效地从家务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让家务劳动发生质变：运动的规模越大，男性——首先是所有的政治激进分子——就越不会依靠女性来照看孩子。与此同时，运动构建的新社会氛围为儿童、男性和女性提供了社会空间，而这与国家组建的日托中心无关。这已经是斗争的胜利了。正是因为这是由本质上属于一种斗争的运动所带来的，所以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斗争而替换任何种类的“合作化”。

[ 15 ] 在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解中，“性”（sexuality）指的是一系列聚集于某种生殖器感受（又不完全局限于生殖器）有关的行为、期待、叙事、愉悦、身份认同和知识。见何春蕤《性/别研究的诞生》，收于《性/别研究的新视野（上）》（元尊文化 1997 年版）。——译注

[ 16 ] 无法确定这些趋势会在多长时间内继续推动运动向前发展，无法确定这些趋势何时才能调转方向。

[ 17 ] 一些英文的读者率先发现，妇女工作的定义可以更加准确。我们确切的意思是，作为工作的家务劳动在马克思看来是具有生产性的，即产生剩余价值。我们随即讨论了整个女性角色的生产力。如果希望从工作和整个角色两方面弄清楚妇女的生产力，请见我们正在写作的另一篇文章。本文是从整个资本

主义循环的角度就妇女的位置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18] 见前言（即《初版前言》，见101页——编注）。

[19] 然而，这正在被反向趋势所抵消，即让妇女进入某些特定部门的行业中。行政部门内资本的不同需求产生了不同甚至对立的宣传和政策。在过去，家庭的稳定性是以相对标准的神话（政策和宣传整齐划一、由官方宣布且无异议）为基础的，而今天资本的各个部门却相互矛盾，推翻了家庭作为一个稳定、不变、“自然”单元的定义。与此相关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生育控制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财政政策，如英国政府最近将生育控制资金拨款增加了一倍。我们必须探究在多大程度上这一政策与种族主义移民政策相关，即对成熟劳动力来源的操纵；在多大程度上与不断削弱的职业伦理导致了得不到支持的失业母亲发起运动相关，即生育控制通过产生具有革命性的孩子，污染了资本的纯粹性。

[20] 这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一项政策，他们多年前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法案，给年满五十五岁的在家妇女发放一笔养老金，其中既包括家庭主妇也包括单身妇女。但该法案从未通过。

[21]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要给家庭主妇付工资，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妇女运动中反对之声也越来越小。文件起草后（1971年6月），相关辩论也变得愈加深刻，由讨论的相对新

颖性而产生的诸多不确定性也渐渐消除。但是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妇女需求的重要性不仅激化了运动的需求，还给了我们更大的力量和信心来向前发展。一年前意大利运动刚开始时，仍有人认为国家可以通过每月为家务劳动支付七至八英镑的津贴，来轻易地镇压妇女对家务劳动的反抗，因为连依靠养老金生活的“地球上的受苦人”都有津贴。如今这些不确定性大部分都消失了。人们明白在任何情况下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的要求只是一个基础，一个视角，并以此为出发点继续向前发展，工资要求的优点主要是将女性的压迫、服从和孤立与其物质基础——女性剥削——联系起来。此时此刻，这可能才是家务劳动工资需求的主要功能。这立即为斗争做出了指示，指出了组织的方向，压迫和剥削与种姓和阶级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视角的一个常见的实际应用是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运动所要面临的任务。

[ 22 ] 我们对食堂的看法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关于家务劳动的工资，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讨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混乱。如前所述，家务劳动可被制度化成为工厂工作，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摧毁这两个制度。但是除了我们提出的要求外，关于要求本身仍然存在着误解。这个目标不仅是一件东西，而且如任何时候的资本一样，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关系对抗的阶段。不管



赢得的是食堂还是工资，都是我们依靠斗争的力量所取得的胜利或打赢的胜仗。建立在这种力量之上的是，这一目标是否会变成资本对我们劳动进行合理控制的契机，是否会变成我们削弱资本对我们劳动进行控制的契机。当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时，目标的各个组成部分，不管是工资还是食堂抑或是自由的生育控制，都将得到提升、出现，事实上这些都是由斗争创造出来的，代表了我们在斗争中实现相关权力的程度。

[ 23 ] “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中央编译局译，第 561 页——编注）。

[ 24 ] 纽约的一个社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是美国黑人社会中史无前例的艺术勃发期。——译注

[ 25 ] “但是，另外一个较为基本的反对意见将在本书的以下各章加以发展，这个反对意见来源于我们不同意工资协议可以直接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这一假设条件。……我们将致力于证明：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的是某些其他的因素……我

们将进行争辩并且指出：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在这一方面的运行，一向存在着原则性的误解。”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高鸿业译，第 18 页——编注）。我们认为“其他的因素”首先是指妇女。

[ 26 ] 我们已经注意到，1917 年之后，很多布尔什维克在落魄贵族中找到了女性伙伴。当在国家层面和个人关系中，权力依然掌握在男性手里时，妇女依然是“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见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中央编译局译，第 119 页——编注 ]）。“新沙皇”的产生说来话长。《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决定》（1921）中“妇女工作”的第一部分写道：“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确定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即不存在‘特定的妇女问题’，不存在‘特定的妇女运动’，劳动妇女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各种联盟，以及来自于拥有社会妥协者式和机会主义者式奸诈手段的妇女工人的任何支持，都会破坏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了结束妇女的奴役，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理论是男性的，在实践中需要“中和”。让我们引用另一位创始人的话：1922 年 3 月 26 日，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共产主义妇女大会上，“葛兰西同志指出，家庭主妇构成了无产阶级妇女中的绝大多数，必须在家庭主妇

间发起特别行动。他说她们应该以某种方式与我们建立起的特殊组织发生联系。只要人们还关心家庭主妇的工作质量，家庭主妇就同工匠类似，因此她们也很难成为共产主义者；然而，由于家庭主妇是工人的伴侣，由于她们以某种方式与工人们一起生活，所以她们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吸引。因此我们的宣传便可以影响到这些家庭主妇；就算不能把家庭主妇带进我们的组织，至少也能中和她们；这样她们就不会妨碍工人们展开斗争了。”（来自《伴侣》第一年度第三期 [1922年4月2日]，这是意大利共产党中一个负责妇女工作的机构。）

[27] 这个名字来自在二战期间负责控制价格的政府部门，即价格管理局。

[28] “……韦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向我们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都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

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中央编译局译，第 877-878 页——编注）。

[ 29 ] 1971 年 3 月 9 日的《金融时报》表明，许多资本家都不愿“任命”妇女担任中层管理职位。作为“应该感恩的外人”，妇女要降低薪酬结构，但是“至少在一开始”，还要成为管理我们其他人的能量和活力的源泉。

[ 30 ] 如果这看起来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看看我们 1971 年在英国游行时所要求的吧：同工同酬，免费二十四小时育儿服务，平等的教育机会，节育和按需堕胎。在更广泛的斗争中，其中的一些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立场是，他们接受我们不养养不起的孩子的事实；国家设施每天二十四小时看护我们能够承受的孩子；这些孩子有同等机会进行训练，在劳动力市场上相互竞争，为同等的报酬出售自己。这些不仅是可以选择的需求，也是资本主义的规划。我们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些要求表达了运动前进的方向，但是在没有独立的女权主义政治框架的情况下，我们会因为不参与而失败。这些要求的构造者是有“阶级分析”意识的女性。

[ 31 ] 心理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武器，即对男性，女性和儿童的操纵。妇女在解放运动中使用它时，它的本质并

没有改变且恰恰相反。在我们允许的程度内，它控制运动，改变运动的性质来为其自身服务。不仅是心理学，“妇女的解放需要：摧毁作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学，这个社会服务本身就是社会是‘正常’的主张，如果你是一个叛逆的人，你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消灭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它们软磨硬泡地说服我们自己‘问题’只是个体的心病，我们必须适应这个疯狂的世界，这些所谓的“学科”和“科学”将越来越多地吸纳我们的要求，以便在他们的管理下将我们的力量有效引导至安全渠道。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些渠道，否则他们就会处理我们；一劳永逸地质疑社会工作者、进步教育者、婚姻指导顾问和所有专家，他们的功能是保持男性，妇女和儿童在社会框架内运作，他们都拥有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前额叶切开术。（见谢尔玛·詹姆斯《美国家庭：衰退与重生》，收于《从女权主义到解放运动》）

[ 32 ] 马克思自己似乎并没有提到过，为什么这样需要更多地阅读他而不是他的解释者。首先，可以说他将消费视为生产的一方面是独树一帜的；其次，他一个人便给了我们自己分析的工具；最后，马克思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恩格斯的那种废话。尽管恩格斯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从布尔什维克到卡斯特罗，他给了“马克思主义者们”和革命政府针对女性制定落后和反动

的妇女政策时所需的权威。

[ 33 ] 我早些时候提到达拉·科斯塔探讨了妇女为什么退化的问题，“据我所知，达到了从未企及的程度”，她从以往的三次尝试中脱颖而出（可以在《从女权主义到解放运动》中引用的段落里找到）。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写的《妇女解放政治经济学》试图回答同样的问题。我认为她失败了，因为它的理论基础不是马克思而是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仅是她引用的几段曼德尔，就足以揭露其现代托洛茨基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持保留意见的是曼德尔对于在家中工作的妇女的看法，本斯顿同意他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二类产品不是商品，而是保持简单使用价值的所有产品，包括家庭生产的产品。尽管这种家庭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劳动，但仍然是使用价值的一种生产，而不是商品。每次一碗汤煮出来，或一枚纽扣缝制在衣服上，都构成生产，但不是市场的生产。”（见《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廉佩直译，第10-11页——编注]）即使是标题，也背叛了内容的虚伪：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否定了政治经济学，工人阶级在实际上反对它。经济学将人与人之间的定性关系分解成事物间的区域化

和量化关系。当我们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下成为商品时，我们成为生产中的因素，对象，性，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科学的其余吸血鬼部分设定计划并试图控制的对象)。朱丽叶·米切尔 (Juliet Mitchell) 也认为，尽管妇女“对人类来说，她们必不可少，然而，她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却被忽视”(见《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 1997 年版，李银河译，第 9 页——编注])。在我看来，她的方法的错误是，一个马克思的解读者再一次成为了她的向导——这次是阿尔都塞 (Althusser)。经济社会和政治角色的分离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政策。劳动力是妇女在家里生产的商品，是把财富变成资本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买卖将市场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妇女不在家庭、工厂、医院、办公室的边缘，我们是资本的再生产和覆灭的根基。多伦多的佩吉·莫顿 (Peggy Morton) 在其精彩的文章《一个女人的工作永远无法完成》中指出，家庭是“劳动力维护和复制劳动力的单位，家庭的结构在任何时候都由经济制度的需要决定。对于某种劳动力……”在恩格斯之后，本斯顿呼吁，资本主义将家庭工作的工业化作为“就业机会的真正平等和除非妇女走出家庭，否则家务劳动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前提条件”，就是说，如果我们得到工作，按照她的说法，资本将工业化我们只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的地区；

这赢得了我们与男人一同平等被剥削的权利。有了这样的胜利，我们不需要失败。另一方面，莫顿不是在寻找我们可以从敌人那里获得哪些让步，而是要找到方法摧毁他。“我们经常忘记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妇女，建立群众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建立群众运动，而是革命。”本·斯顿说，“没有为妇女运动的战略提供任何依据。在运动中缺乏这种分析的动机，通常会鼓励我们之间变成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一语中的。

[ 34 ] 那些相信社会工厂的斗争不是政治斗争的人注意了，在这里，比起在工厂里，国家是工人生活更直接的组织者，特别是如果她是一个女人。在这里，工人更直接地对抗国家，不存在个别资本家的干预以及工会的调解。

[ 35 ] 加州南部在战争期间涌入大量移民。在 1940 至 1946 年间，圣地亚哥的人口增加了 61%，而洛杉矶增加了 29%。

[ 36 ] 有孩子但无丈夫供养而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妇女。——校注

[ 37 ] 这是实实在在的冲突。正如我写的那样，意大利妇女运动正在回应一些左派男性的袭击，这个月，在罗马就发生了一场肢体冲突。当时，女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女权斗争”（Lotta Femminista）在女子大学举办一场关于就业的国际研讨会，自然没有男性参加。这些人管我们叫做“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



主义者”，破坏了研讨会。我们以牙还牙，没被打败。事实上，我们对这种暴力的武力还击使得我们更加团结一致。

[ 38 ] 即使他失业的时候。在最近的一场索赔人联合会（Claimants Union）会议上，左派组织之一的成员通过其中一份内部文件下达了以下指示：“我们在 C.U. 工作，应该是使 C.U. 远离无人赡养的母亲、病人、老年人等，而将注意力转向失业工人。”当联合会的一些妇女发现该文件，并为了会议本身而复制该文件时，引起了一阵骚动。这种对弱势阶级的蔑视是可怕的。如果男工人是政治框架的唯一主体，那么，一旦妇女在斗争中担当起主要作用，传统的政治框架就会被打破。

[ 39 ] 这是一个迫切而实际的问题，不仅对索赔人联合会是如此。比如，爱尔兰运动的武装部队一直以男性为主导，控制着妇女和儿童参与斗争的程度。如果水果是苦的，妇女就会受到指责。

## 附录



家务劳动的工资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Wages Against Housework

Silvia Federici



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没有工资的工作。

他们称之为冷淡。我们称之为旷工。

每一次流产都是工伤。

同性化和异性化都是工作环境……但是同性化是工人对生产的控制，而非工作的终结。

更多的笑容？是更多的金钱吧。在摧毁笑容的治疗作用方面，没有什么比金钱更强大了。

神经症、自杀、失去性欲都是家庭主妇的职业病。

当女性在讨论家务劳动的工资时，会表达出种种困难和不确定性，这源于将家务劳动的工资贬斥为一种物、一沓钱的观点，而非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视角。这两种立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将家务劳动工资视为一种物而非一种视角，是为了将我们斗争的最终结果与斗争本身分离开来，是为了在去魅和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用以限制女性角色的过程中，忽略其重要

性。当我们以物化的方式来看待家务劳动的工资时，我们开始扪心自问：更多的钱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甚至会同意，对于很多那些除了家务劳动和婚姻之外别无选择的女性来说，更多的钱确实会带来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看起来拥有其他选择的女性来说，例如专业工作、开明的丈夫、公共生活、同性恋关系中的一种或几种，更多的钱根本不会带来太大的区别。但凡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实现经济独立，我们就不会通过将自己认定为家庭主妇来实现经济独立，我们都认为家庭主妇的命运可以说是比死亡更糟糕。这一立场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通常会给糟糕的生活加一点钱，然后说“那又怎样？”，其前提是我们可以在斗争中在不彻底改变所有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情况下得到那笔钱，但这一前提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家务劳动工资视为一种政治视角，那么我们就明白工资斗争将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社会权力方面发动一场革命。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这笔钱，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身体和心灵卖淫的特殊形式，从中我们得到的钱可以掩盖这一需求。正如

我接下来将论证的那样，家务劳动工资不仅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视角，而且也是唯一一种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最终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视角。



## 爱的劳动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当我们谈论家务劳动时，我们谈论的是跟其他工作不一样的一种工作，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操纵，是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各个部分犯下的最微妙、最神秘的暴行。诚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每个工人都遭到了操纵和剥削，他/她与资本的关系也被彻底神秘化。工资给人一种公平交易的印象：只要工作就会得到报酬，因此你跟你的老板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工资不是为了工作而支付的报酬，而是为了隐藏成为利润的所有未付薪的工作。但是工资至少承认你是一名工人，你可以围绕和针对工资的条件和数量、工作的条件和数量进行讨价还价和发动斗争。领工资意味着属于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关于其中的含义暂无疑问：你之所以工作，不是因为你喜欢工作，也不是因为工作自然而然地找到你，而是因为只有工作你才能生存。但是尽管你备受

剥削，你也不是工作本身。今天你是邮递员，明天就有可能成为出租车司机。重要的是你不得不干多少工作，你能得到多少钱。

但是说到家务劳动，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同之处在于，家务劳动不仅强加于妇女之上，还变成了女性体格和人格的一种自然属性，一种内在需求，一种渴望，估计是来自于女性角色的深处。因为从资本开始为女性计划家务劳动时就是没有工资的，所以家务劳动不得不转化成一种属性，而非社会契约。资本不得不说服我们家务劳动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令人感到满足的活动，这样我们才能接受无工资的劳动。反过来，家务劳动没有工资的事实也成了巩固家务劳动不是工作这一常见假设最有力的武器，防止妇女就这点展开斗争，唯一例外的是在从厨房到卧室的私下争吵中、整个社会都会嘲笑并进而贬斥斗争的主角。我们都被当成唠叨的娘们儿，而不是斗争中的工人。

但是要让成为家庭主妇变作一件自然的事，至少需要进行二十年的社会化，即由没有工资的母亲每天进行培训，才能让一位女性做好准备成为家庭主妇，

才能使她相信孩子和丈夫是她能从生活中得到的最好报答。尽管如此，也很难成功。无论我们多么训练有素，但当婚礼结束后站在肮脏的水槽前时，所有的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上了当。我们中有很多人仍然抱有幻想，觉得自己是为爱结婚。我们中有很多人承认是为了钱和安全感才结的婚；但是是时候进行澄清了，尽管在婚姻中爱或金钱寥寥无几，但等待我们的工作却堆积如山。这就是为什么年长的女性总是会告诉我们“在可以的时候享受自由，现在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但不幸的是，如果一位女性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接受训练，学会顺从、屈从、依赖，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甚至从中得到乐趣，那么就根本没有可能享受自由。如果你不喜欢做家务，那是你的问题，你失败了，你有罪，你不正常。

我们必须承认资本在隐藏我们工作的方面非常成功。资本以妇女为代价创造了一件真正的杰作。不给家务劳动工资，将其转化为一种爱的行为，资本真是一石多鸟。首先，资本得到了大量的免费工作，并确保妇女在远离针对资本斗争的同时，将家务劳动当成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最有魔力的一句话是“是的，

亲爱的，你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与此同时，资本通过让妻子依赖于丈夫的工作和工资对男性工人进行规训，通过给在工厂或办公室提供大量服务的工人配备一名仆人来将男性禁锢在这种规训之中。事实上，我们的妇女角色是要成为“工人阶级”没有工资但却快乐、最重要的是可爱的仆人，工人阶级就是资本被迫赋予更多社会权力的无产阶级。就像上帝创造夏娃给亚当带来快乐一样，资本也创造了家庭主妇来给男性工人提供身体上、情感上和性方面的服务，生孩子，补袜子，当他的自尊被资本为其预留的工作和社会关系（孤独的关系）压垮时，家庭主妇还得补缀他的自尊。妇女为了资本而扮演的角色中涉及身体、情感和性方面的服务，正是这些服务的奇怪组合塑造了家庭主妇的仆人特性，她的工作如此繁重，她本身却隐而不现。大多数男性找到第一份工作后会马上开始考虑结婚，这绝非偶然。不仅因为他们现在负担得起婚姻了，还因为只有想到家里有人等着照顾他们，他们才不至于在结束了一天的流水线和办公桌工作后发疯。每个女人都知道如果她们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并拥有“成功的”婚姻必须要做什么。在这

种情况下，一个家庭越穷，对妇女的奴役程度就越高，但这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状况。事实上，资本采用双重政策，一个政策用于中产阶级，另一个政策用于无产阶级家庭。我们总能在工人阶级的家庭中找到最质朴的男子气概，这绝非偶然：男性在工作中受到的打击越多，妻子就越得吸收这种打击，男性就越会以妻子为代价恢复自尊。当一个男人因工作而感到沮丧或疲惫时，或当一个男人在斗争中受挫时（走进工厂大门本身就是失败），他往往会殴打他的妻子，冲她发泄愤怒。一个男人服务的他人越多，受到的颐指气使就越多，就越会到处发号施令。家就是男人的城堡……当他心情不好时，妻子必须学会安静地等待，在他垮掉、咒骂整个世界时，妻子必须学会怎样使他复原，在他说“今晚我太累了”或做爱时间非常短时，妻子必须学会安然入睡，正如一位女性所说，男的还不如对着蛋黄酱罐子做爱。（女性总能找到办法进行反击或展开报复，但总是采用一种孤立和私下的方式。然后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才能让斗争走出厨房和卧室，走上街。）

这种以爱和婚姻为名进行的诈骗影响着我们所

有人，就算是那些还没结婚的人也受到了影响，因为一旦家务劳动彻底自然化、性别化，一旦家务劳动变成了女性属性，所有的女性都将以此为特征。如果做某些事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所有的女性都应该做，甚至应该喜欢做，尽管有些女性因为社会地位不同可以逃避大部分的家务（她们的丈夫可以负担得起女佣和心理医生的费用，以及其他形式的放松和娱乐活动）。我们也许不是在服务一个男人，但是面对整个男性世界，我们确实处于主仆关系之中。这便是为何被称为女性，便意味着被镇压，被贬斥。（每个男人都觉得有权问你“笑一笑，亲爱的，有什么问题吗？”，不管他是你的丈夫，还是检票员，亦或是你的老板。）

## 革命视角

如果从这一分析出发，我们便会看到家务劳动工资要求的革命性影响。通过提出这一要求，我们的本性结束了，我们的斗争开始了，因为要求家务劳动工资意味着拒绝承认工作是我们本性的延伸，因此也拒绝接受资本为我们构建起来的女性角色。

要求家务劳动工资本身就会破坏社会对我们的期望，因为这些期望正是我们社会化的本质所在，正是这些期望导致了我们在家没有工资的现状。

就此意义而言，将女性的工资斗争与男性为了争取更多工资而在工厂展开的斗争相提并论是非常荒谬的。虽然雇佣工人争取更多的工资是在挑战他的社会角色，但是他仍然没能跳出社会之外。当我们为工资而斗争时，我们会毫不含糊地展开斗争，直接反抗我们的社会角色。同样地，在雇佣工人的斗争和奴隶为了工资反抗奴隶制的斗争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

然而需要弄清楚的是，当我们为工资展开斗争时，我们并不是为了进入资本主义式的关系，因为我们从来没能摆脱这种关系。我们努力打破资本的妇女计划，这是工人阶级内部劳动分工和社会权力计划的关键时刻，借此资本能够维持其权力。家务劳动工资之所以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要求，不是因为这一要求本身破坏了资本，而是因为这一要求对资本展开了进攻，强迫资本以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式重新构建了社会关系，这种方式也更有利于整个阶级的统一。事实上，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得到了工资我们会继续承担家务劳动。恰恰相反。提出家务劳动工资的要求，是拒绝进行家务劳动的第一步，因为提出工资要求让我们的工作不再隐形，而显形则是展开家务劳动斗争最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近处说事关家务劳动，从远处说事关女性角色。

对“经济主义”的任何指控展开反击时，我们都应该铭记钱就是资本，即控制劳动的权力。因此重新占用作为我们劳动成果的金钱，也是我们母辈和祖母辈的劳动成果，意味着同时也可以摧毁资本强制我们进行劳动的权力。我们不应该不相信工资在令我们的



女性化去魅、让我们的工作（作为工作的女性化）显形方面具有强大的力量，因为零工资在塑造女性角色、隐藏相关工作方面是如此地有力。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就是让家务劳动显形，我们的心灵、身体和情感因某一特定功能而遭到了扭曲，之后却抛回给我们，并成了一种典范，如果我们想要社会接受我们的女性身份，就必须遵守这一典范。

我们要求家务劳动工资是要揭露一个事实，那就是家务劳动对于资本来说就是金钱，资本已经并正在从我们的烹饪、微笑和做爱中谋利。与此同时，我们之所以一年又一年地烹饪、微笑和做爱，不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更简单，而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脸庞因为笑得太多而出现了扭曲，我们的感受因为关爱太多而出现了迷失，我们的过度性化让我们失去了性。

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只是开始，但是其中传达出的信息却是清晰的：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给我们报酬，因为作为女性我们不再保证做任何事了。我们想要把家务劳动也称之为工作，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发现到底什么是爱，并构建出我们前所未有的性。从工作的视

角来看，我们要求的不是的一笔工资，而是多笔工资，因为我们被迫同时从事多项工作。我们是女佣、妓女、护士、心理学家；这就是“母亲节”庆祝的“英雄”配偶的本质。我们想说：别再为我们的剥削、所谓的英雄主义庆祝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想为每一分每一秒的家务劳动得到报酬，这样我们就能拒绝一部分的劳动，并最终拒绝所有的劳动了。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显示我们的女性美德也具有一种可以计算的金钱价值更有效的了，直到今天只有资本在通过击败我们不断增长；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为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组织权力的方式对资本展开反抗。

## 社会服务的斗争

这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激进的视角了，因为尽管我们想要各种东西，包括日间护理、同工同酬、免费的自助洗衣店，但除非我们从根本上攻击女性角色，我们永远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我们不率先建立家务劳动也是工作的观点，那么我们的社会服务斗争，即为了更好的工作条件的斗争，会一直地失败。除非我们就整体展开斗争，否则我们永远也不会取得胜利。我们不能以无穷无尽的工作为代价来爱，这种工作正日复一日地摧残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我们的社会关系，除非我们首先对此展开斗争，否则我们将无法取得成功；给予和接受好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作义务，我们不断地对我们的丈夫、孩子和朋友感到愤怒，并为之感到内疚，除非我们首先逃离这种勒索，否则我们将无法取得成功。找兼职也无法改变女性的角色，因为在家外工作的女

性一直期盼着变化的到来。兼职不仅增加了我们的剥削，还让女性角色演变出了多种形式。无论在哪，我们都能看到女性从事的工作不过是家庭主妇各个方面的延伸。即，我们不仅成了护士、佣人、教师、秘书，这些功能我们都在家里接受了良好的训练，但是阻碍我们在家展开斗争的障碍仍然束缚着我们：孤立，其他人得靠我们才能生活的事实，或者是无法看到我们的工作在何处开始、何处终结的事实，无法看到我们的工作在何处终结、我们的愿望在何处开始的事实。给老板倒杯咖啡，跟他聊聊他的婚姻问题，这属于秘书工作的一部分吗？还是属于私人交往？我们不得不注意上班时的仪容，这属于工作环境的要求吗？还是女性虚荣心的结果？（直到最近，因为害怕遭到解雇，美国的空姐还需要定期称重和长期节食。这种折磨每个女人都知道。）人们常说，当雇佣劳动市场需要女人时，一个女人便可以在不丧失女性气质的情况下从事任何工作，这意味着你不管做什么，都只是个女人。

至于将家务劳动进行社会化和集体化的建议，几个例子将足以说明这些替代方案和我们的视角之间

存在着区别。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建立一个日托中心、要求国家为此埋单是一件事。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国家并让国家控制、规训和教导他们以美国国旗为荣，不是在五个小时，而是在十五或二十五个小时内都这么做，是另一件事。以我们想要的方式集体组织用餐（单独用餐、团体用餐等），然后要求国家为此埋单是一件事，让国家为我们组织用餐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在某种情况下我们重新得到了生活的控制权，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却助长了国家对我们的控制。

## 家务劳动斗争

一些女人会说：家务劳动工资将会如何改变丈夫对我们的态度呢？一旦我们得到了工资，丈夫难道不会像以前那样继续希望我们承担相同的义务吗？甚至更多？但是这些女性没有看到，他们之所以想让我们干这么多的事，正是因为没有工资，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家务劳动是“女人的事”，不会花费我们太多的精力。男人之所以能够接受我们的服务并以此为乐，是因为他们认为家务劳动对于我们来说轻而易举，我们也乐在其中，因为我们爱他。他们确实希望我们能够感激他们与我们结婚、与我们生活，感激他们给了我们以女人的身份表达自己（即为他们服务）的机会，“能够找到像我这样的男人是你的幸运”。只有当男人将我们的劳动看成是工作，将我们的爱看成是工作，最重要的是看到我们拒绝两者的决心时，他们才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当成百上千的女性走上街头，

说出无休无止的清洁工作、必须总是在感情方面做好准备、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被迫做爱很难时，说出讨厌的工作正浪费着我们的生命时，他们才会感到害怕，并因是男人而感到受伤。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了，因为通过揭露资本分裂我们的方式（资本通过我们对男人进行规训，通过男人对我们进行规训，让我们彼此为敌），作为男人拐杖、奴隶和锁链的我们开始了他们的解放进程。就此意义而言，家务劳动工资将比试图证明我们能和男人一样工作、我们能从事与男人一样的工作更有教育意义。我们把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留给“职业女性”，她们从压迫中逃离出来，靠的不是团结和斗争的力量，而是主人的力量，压迫其他女人的力量。我们不必证明我们能够“克服蓝领障碍”。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克服了蓝领障碍，并发现工作服并没有赋予我们比围裙更多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力量甚至会更少，因为现在我们必须既穿工作服也穿围裙了，因此斗争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少了。我们必须证明的是我们揭露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的能力，揭露资本在我们反资本的斗争中对

我们和我们的权力所做事情的能力。

不幸的是，很多女性，特别是单身女性，对家务劳动工资的观点敬而远之，因为她们害怕被贴上家庭主妇的标签，甚至连一秒都无法忍受。她们知道家庭主妇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所以她们不想承认自己也是家庭主妇。这正是她们的弱点，这种弱点因为缺乏自我认同而维持下来并长期存在。我们想说也不得不说的是，我们都是家庭主妇，我们都是妓女，我们都是同性恋，因为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奴役身份，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的斗争，因为只有我们认为我们能更好，而不仅仅是家庭主妇，我们才能接受主人的逻辑，即一种分裂逻辑，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奴役的逻辑。我们都是家庭主妇，因为不管我们身处何处，他们都希望我们做更多的事，害怕我们提出要求，希望减小他们的金钱压力，因为他们希望我们的心指向别处，希望我们盼望着现在或未来会出现一个男人来“照顾我们”。

如果说靠此就能逃离家务劳动，那么我们是在欺骗自己。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尽管在家外工作却还得做家务？我们真的能够轻易抛弃与男人一起生活的想



法吗？如果我们失去了工作该怎么办？就算在今天年轻（生产力）和吸引力（女性生产力）只能赋予我们很小的力量，那么衰老和失去这种力量又会怎样呢？孩子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后悔选择不要孩子，后悔甚至没能现实地提出这一问题？我们能承受同性恋的关系吗？我们愿意为孤立和排斥付出代价吗？我们真的能负担得起与男人的关系吗？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替代方案只有这些，什么样的斗争才能让我们实现超越？

纽约，1974 年春

马新 译

1970 年代意大利的  
女权主义、工人主义及自主主义

帕特里克·卡宁厄姆

Italian feminism, workerism and autonomy  
in the 1970s

Patrick Cuninghame



我们在黑格尔的脸上吐痰……他的“主奴辩证法”只涉及男性群体之间冲突的解决，并不涉及妇女的解放问题，而妇女正是父权文明历来所压迫的大群体……在主奴辩证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阶级斗争同样排斥女性。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保持怀疑的态度。

——卡拉·兰西（Carla Lonzi）

妇女运动往往是“自主性”的先锋实践者之一。历来，那些所谓的“革命党”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的而阶级问题才是首要的，性别议题从属于阶级议题，要推迟到获得国家权力成立社会主义之后。女权运动尤其倾向于自主，因为妇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被

各种社会关系上的父权所压迫，包括在左翼政党、工会、社会运动和革命组织中也被压迫。在意大利及其他国家从 1968 年的社会风暴中获得极重要却意义模糊的经验之后，女权主义者属于最早对“新左派”政治形式和实践提出基础性批评的理论家。她们指出，新左派实践上（哪怕不是理论上）轻视了妇女的特殊需要和情况，将其服从于阶级斗争的需求，在这方面与制度化的老左派组织差别不大。这种批评引起许多妇女在 1970 年代初离开新左派的政党和团队，成立最早的自我管理的女权组织，从而加深了新左派的危机（该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是否要参与“武装斗争”）。在意大利，这个危机最后导致了新左派的解体，以及在它残余的基础上，一场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自主运动”（Autonomia）的营造。虽然该社会运动受到了女权主义批判的影响，但只有很少女权主义者参与。

原本作为工会与制度化左翼政党一种倾向的工人主义也深深影响了意大利的女权运动，尤其是通过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莱翁波迪亚·佛图拉提（Leopoldina Fortunati）等“女权斗争”成员的理论与

政治工作。“女权斗争”为赢得家务工资而组织抗争，她们将家务置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战略高度上，认为家务活是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和照顾同代的男性的行为，但这一行为这所创造的价值却未能使女性从国家和市场那里获得报酬，正如《新女权主义运动》的作者们在小册子里面所宣扬的：

女性所做的是高达平均每周 99.6 个小时的工作，既没有罢工的可能，也无法缺席，也不能提出任何要求，是完全无偿的劳动。

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到欧洲和北美，由此发起了最早的跨国社会运动之一——“家务有偿化”，并针对福利国家提出批评，认为它不过是保障性别分工与劳工再生产的工具。这导致了她们与其他女权主义组织协作，在七十年代中期一轮大规模为争取堕胎与离婚权力的抗议之后的间歇期，创立了替代性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在健康、生育控制、堕胎与防治家暴领域。因应八十年代上述运动遭遇的危机，女权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学术工作，这些工作集中

在后凯恩斯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并做了很多关于原住民抗争、环保主义抗争以及反战争抗争中的条件与形势的比较研究。

“自主运动”比较缺乏“女性的记忆”，这体现了在所有社会里，这种声音被压抑和忽视的历史倾向，即使是自主（独立）的和反专制的左翼话语中，女性的声音仍然自外于或者混同于男性的话语。女权主义的方法论抨击非学术化的迷思，将社会研究呈现为一种对话模式，在这种对话模式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过去经历都必然影响和激发对话。

接受了这一方法论的考量，及勾画出意大利女权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历史进步，本文将辨别并讨论在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在家庭外参与有偿劳动是否有助女性独立与社会解放的问题上，意大利工人主义女权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分离主义三种女权主义者的主要区别。首先，它勾画出围绕无偿再生产，本国劳工及资本家对女性的生理与性暴力等议题的两大工人主义女权主义的出现，即“女权斗争”和“家务有偿化”；第二，女权主义以及“自主运动”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也会被讨论。与意大利其他女权主

义相比，这篇文章的结论将建立在检视持续受工人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上。



## “女权斗争”与“家务有偿化”： 对暴力及无偿劳动力再生产进行的斗争

紧接着 1969 年的“火热秋天”运动，“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在如潮的野猫罢工与工业、社会的普遍矛盾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以基于工厂的自主工人运动并通过北方工厂中的自主集会，持续地抵抗着资本家的剥削与改组。同时，更广泛的自主和民主化形式传遍整个工人阶级，包括无偿劳动部门，如家庭主妇、学生、失业者和义务兵，其深远影响直达中等和专业阶级。最显著的进展是意大利的第一个普遍动员的妇女运动，引用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的话：“它有两个灵魂：一个是自我意识，另一个是（‘女权斗争’那样的）工人主义女权主义，它逐渐演变成以小组和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争取‘家务有偿化’的运动。”

德拉·波尔塔（Della Porta）认为意大利女权主义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显著特点是其运动组织的群众性：

1974年，一万名女性参加了在皮纳雷拉的全  
国会议；1975年和1977年之间，国家一系列的  
举措——主要关于堕胎合法化的议题——每次  
都有三到五万位妇女参与。……1975年1月18  
日在罗马出现了第一次关于堕胎的大规模示威，  
有两万人参与……在1976年4月，（与意大利共  
产党有联系的）“意大利妇联”和其他政党的妇  
女团队同意一起参加一个分离主义的示威，有超  
过五万人参加。

一些前“工人力量”的理论家，也积极参与女权  
运动，他们的抗议主要集中在抗议无偿劳动力再生产  
的主题上，它被视作为是活劳动力，因此也是资本再  
生产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很大部分是受玛利亚罗  
莎·达拉·科斯特在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理论影响，  
以及受艾莉莎·德尔·热（Alisa del Re）从受工人主  
义影响的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对福利国家的批判的影  
响。根据前者的理论，在付酬/生产性劳动力（产业  
工人阶级）和无偿/再生产性劳动力（妇女、学生、

失业者)之间有等级区分。因此,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寻求从官方工人阶级组织中以及彼此中寻求自主。

在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吉尔安娜·弗兰卡·达拉·科斯特(Giovanna Franca Dalla Costa)以及莱翁波迪亚·佛图拉提等人的作品的基础上,“女权斗争”开拓了一个名为“家务有偿化”的运动,与谢尔玛·詹姆斯在英国类似的运动联合起来。同时,在美国与加拿大也有“家务有偿化”团队:在纽约有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在多伦多有朱迪斯·拉米雷兹(Judith Ramirez)。这个网络还延伸到德国和瑞士。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如此描述“女权斗争”的政治原则和策略:

我们要求家务给报酬主要是回应女人缺钱的严重问题,但也是一种在服务领域显示力量的方式[……]。这个要求同时也结合另外一个要求:给所有女人男人大量减少家庭外劳动(按算每个工作周二十小时算),好让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解放出来,而不需要从更多层次的劳动里找(很不足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这也为旨

在家庭以外工作的解放主义立场提供空间，其目标仅是争取家庭外工作，加强社会服务。这是制度化左派的立场，但也是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立场。

然而，向国家要求家务报酬触发了跟女权主义运动其他意见者的严厉论战，他们把这样的要求看为“背弃社会化家庭劳动的目标”。

1974年6月，在要求“家务有偿化”和把此看为对家务劳动的“肯定”的两方论争中，若索（Rosso）通过帕多瓦市的“家务有偿化委员会”发布了一个与梅斯特雷市的女权运动所进行的三天讨论的报告。很多家庭妇女、老师、商店助理、秘书为了控诉他们从雇主、伴侣和国家受到的三层剥削而聚集起来了。她们抵制所有人给她们强加上令她们担忧和恐惧的工作状况。“我们的斗争是针对工厂、[……]办公室，针对整天要坐在收银台[……]。我们不是为了获取这种工作组织而斗争，而是根本上反对它。”

她们槟斥了政党和议会外组织的看法。后者相信妇女的解放将通过就业来实现，而她们却要求国家补

偿她们的无偿家庭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国家最基层的结构是核心家庭，而她们为国家“再生产”了公民和工人。她们还控诉了微薄的社会服务的不足：给家庭妇女和就业妇女服务的托儿所的短缺，以及女人身体在“男性主义”医疗系统中遭受虐待。她们呼唤女人抢回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控制：

我们女性必须拒绝国家试图强加于我们的生存底线。我们需要要求得更多，要重新调整被拿走的财富——金钱、权力、和他人（比如女人、老人、孩子）相处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成为社会个体，而不再作为附属品。

过去，在人数拥挤、资金短缺的教育系统问题上，女性也表现得甚为活跃，因为这是 1970 年代中期所有社会问题的本质。在女权运动动员阶段的巅峰，为了要求更好的学校和日用设备，她们做了许多事情：进军到学校，组织纠察队，占领教室，设置路障，等等。

这些动员是在新左派和“自主运动”的参与下自

发组织的，最明显的是南部的“不断斗争”（Lotta Continua）和一部分工会。然而，总体来说，它们具备独立于任何政党并且对政党保持警惕的特色。

类似的冲突随之发生在社区对再生产需求（如住房、出租、账单和购物）和休闲需求（外出吃饭、看电影和摇滚音乐会）的控制上。这些冲突与新兴女权运动对自己身体和生活的控制权的需求有结盟。女权运动打败了要废止 1970 年离婚法的 1974 年公决，并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争取到堕胎合法化（1978 年通过的第 194 法条）以及在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民主化和女权化。至此，她们需要一个“自主”的新概念，来反映从工业工厂到社会工厂、从传统工人阶级奋斗到新社会运动斗争的过渡。

然而，七十年代早期的女权运动因为其活动强度而在参与者的健康和私人生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他们从前抨击过新左派的强迫性战斗性、和为了政治争斗而牺牲所有私人生活的行为。据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叙述：

我们有国内和国际的团体，但最让人震惊的

是执行所有这些活动的方式都极端拮据。沟通的主要方式是传单和我们的报纸《家庭工人》。这种激怒人的、无孔不入的战斗性，源自“工人力量”的经验。但我想，同时期的团体境遇也跟我们差不多，尤其是我们当领袖的当然更感到艰难。在此，有些事情要强调……1970年代末，我们对那样的生活和活动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原本就比男人（包括我们的同志）更狭窄的再生产空间都被侵蚀了。

“女权斗争”和“家务有偿化”的妇女们对国际女权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关注男性在家庭内对女性事实的身体和性暴力作为一种规训性力量存在的方面。这与工厂采取身体和精神暴力规训工人相似。在这个问题上，莱翁波迪亚·佛图拉提和吉尔安娜·弗兰卡·达拉·科斯特的作品有重大意义。后者曾这样论述：

开始时，女权运动控诉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事实上，这是第

一个围绕它发展出大规模辩论和高度组织化抗争的议题。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并非伴随资本主义而生，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孕育出来的，尽管这类暴力的某些方面没有改变（早在资本主义萌发之前，妇女就经历被打、被强暴、被杀、生殖器被残缺、被迫流产或养育孩子等暴力）。在资本主义下，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被重新建构，并被赋予了一个功能……完全内化的角色——女性必须做家务。……这类工作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工作，它的工作范围是家庭。……资本和女性关系上的极端的暴力表现在男女关系上：男性对女性加剧暴力的关系。

这位作者批评了工人运动（包括所影响她和其他“女权斗争”及“家务有偿化”成员的工人主义）的一个盲点：当时工人运动未能聆听和理解她们理论的新奇之处，而是把“家庭工人”的概念等同于工厂工人：

像所有女人，我们从骨头里感觉到……我们



是“家庭工人”，“在家庭内，每位女人都是无偿工人！”自从我们开始这样自我认同，左派的一部分就给我们戴上了“老式工人主义”的帽子，因为他们把“家庭工人”等同于“工人”，并把他们自己编的理论归于我们。男性左派的这种耳背并没让我们惊讶：至于既看不到又听不到女性的男人而言，除了说教便没别的什么了。

男性左派如此封闭的态度与女权运动关于无偿家庭劳动争论的严肃态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把女性视作无偿劳动家庭工人的观点已经成为了一种共通的历史遗产。连不认同“家务有偿化”的策略的女权主义运动阵营都以多方面相似的方式定位女人的状况。将家庭劳动者和奴隶之间的状况进行比较相当重要，伴随着我们的分析，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塑造这个论述。因为女权主义运动在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中掀起了政治动员浪潮，使得这个论述显得更加有必要。暴力的兴起与今天女性不断高涨的反抗有显然

的关系，同时也跟国家和掌权人士妨碍她们的不断高涨的意志有关。

## 女权主义和“自主运动”的关系

当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强烈地要求她们的健康和私人生活权利时，那些一边选择在女权主义运动中行动的人同时又在新左派运动和社会运动中经历了一种恶化的“双重战斗”的人们选择提出她们自己的要求。同时，女权主义者（包括那些扎根在“工人力量”等工人主义团队中的女权主义者）与自主主义者的关系就像她们与左派组织的关系一样紧张。独立的妇女团队对“组织起来的工人自主”（Autonomia Operaia Organizzata）延续了一些新左派遗留下来的空头支票式的政治实践方式提出批评，特别是针对一些带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暴力使用（有时带有武器），虽然说女权主义自身不能完全等同于和平主义。不仅如此，那些主张“意识苏醒”的女权主义者把工人主义的和自主主义的妇女谴责为老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而后者常常被更广泛的女性运

动疏离。

从“暴力（被理解为一种激进的一意孤行，作为一种对于父权代表下女性被动和顺从特质的解药）可以是一种主观的偏见”的角度出发，这些妇女对在女权主义和自主主义关于暴力和主体性的辩论起到一定的贡献。“不断斗争”的“妇女团队”（Women's Collective）所介入的主要领域是工厂，尤其是“拒绝工作”的实践、工作场所的歧视问题等，还有监狱、运动中的性暴力和大男子主义，以及身体和健康有关的抗争。行动在医院针对不平等的医患关系，并且谴责那些拒绝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疗中心，及那些损害女性身体并且无法满足女性特定健康需求的健康中心。另一个介入的领域是国际上关于“社会连带主义而不是团结”的说法，这一方面建立在“从自己开始”的女权实践上，她们还与激进分离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有来往，后者会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做“意识觉醒”，并且与“激进党”联系紧密，虽然在更广泛的女权运动中，对私人范围、意识觉醒和无暴力的强调备受争议。一个罕见的、反对天主教堂对女性身体和生活控制的不良影响的联合占领行动，发生在 1975 年的米

兰大教堂。后者是这个城市最主要的天主教堂，也是天主教堂的官方代表。另一个行动是抗议在父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女性的被动地作为一味满足需求的性奴隶的刻板成见，婚纱店和相亲中介是行动中最主要的反对对象。她们还参与了莱·梅兰德里（Lea Melandri）的“自由妇女大学”，在这个活动中，家庭妇女和知识分子们举出了跨阶级的作品象征着女性在资本主义下所受到的阶级偏见。若索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合作产生了两本杂志，《坏女性》（*Malafemmina*）和《我们固执者》（*Noi Testarde*）。通过这种合作和交流，“私人生活的政治化”及对性别角色的疑问变成“自主运动”的一部分，虽然自主女权主义者与一部分男性自主主义者“以工人为中心”的立场之间仍然存在冲突。

艾莉莎·德尔·热（她也是“工人力量”的前任成员）的理论和政治实践导致她与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和“家务有偿化”运动之间产生分歧，哪怕她们都来自共同的工人主义背景。虽然德尔·热没有加入自主主义的组织，她却认为自己的活动让她逐渐形成类似于自主主义的立场。这里，她通过考虑意

大利共产党内女权主义者自相矛盾的立场来分析“双重战斗性”的棘手问题：

这很困难，因为它有相互分裂的定义：比如说，我遇见过女性在议会外的政治团体中极其活跃，同时她又是女权主义者，所以这里她面对着戏剧性的选择，因为女权主义逼着女性去做戏剧化的个人选择。敌人通常是在家里：如果一个女性想要获得一种个人自主，并且与那些身处左派中，在改变社会这一议题上有很多共同想法的男人成为恋人、朋友、夫妻、父女或者其他关系，那么她可能会感到很不适。所以当面对非常个人的身份和人生选择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使一些婚姻已经破碎了，一个人不可能总让丈夫离场因为他们有一些作用是正面的。这些决定是如此的激烈和暴力，让我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在家中隐藏自己的女权主义身份，在公众场合时又以同志的身份出现。因为意共有些时候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有些女性认为父亲是仁慈的，他总是或多或少地会接受他们小宝贝的要

求，但在意大利，没有一个政党听取了女权主义团体的需求，至少在七十年代是这样。意共的革命性强烈地质疑家庭传统；我遇见过很多家庭（妈妈、外婆和女儿）是意共的成员，这是一种撕裂的伤痛，因为这是一种历史传统上的钟爱，一个人很难改变。[原本附属于意共的] 妇联对女权运动和离婚运动非常残忍。妇联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特别是1976年，意共在塞维索事件中禁止它的成员在街上做支持堕胎权的游行后（一个受二恶英毒害的怀孕妇女因为担心生出一个怪胎所以想要去堕胎）。妇联从意共分裂出去的时候，许多激进分子脱离了政党，投身于女权运动中。

一位来自米兰的被采访者给出了关于女权运动的不同视角。她曾经是“不断斗争”的成员，七十年代末加入了“自主运动”，直到八十年代才成为女权主义者。她细述了她父亲因为反对她的政治活动而施加给她的暴力，同样的还有来自她伴侣（也是“不断斗争”的成员）的暴力，她还因为另一位女性斗士的

否定态度而倍感压力：

我十四岁加入“不断斗争”因为他们好像是最活跃的新左组织……我父亲经常很暴力地打我，去“保护”我不被卷入这些“危险的政治活动”，所以到十六岁时我就逃家了……我的朋友也打了我好几次，他也是“不断斗争”的成员……之后他因为打了另一位女性所以去接受治疗……

他被其他妇女保护起来。保护他的女人包括我亲密的朋友，她参加过阿根廷武装斗争。当我被打后向她求助时，她说：“嗯，你是掉下了楼梯，对吧？”所有人都说我是因为车祸而受伤，从而保护他，让他免于被警察找麻烦……在武装斗争中，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英雄，有一部分非常小人……当时我不想因为女权议题而破坏组织团结……我们有的人在墙上喷了“男人和女人在斗争中团结”。

关于那些选择当自主主义组织成员而不是独立



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们的特殊身份，同一位被采访者还送到了 1970 年代在意大利北部贝加莫市女性自主主义的一个案例：

每一个城市的运动都是不一样的，都有其独特的认同……在贝加莫她们有强烈的抵抗国家特质……她们从来不会接受国家的基金会资助来供应自我管理的诊所……因为女性自主主义的努力，很多的这些诊所还存在……她们自我筹款，主要领导还是原来那些人……在其他城市，她们更加多关心的是关掉色情电影院……她们来自一些反强奸的斗争中，她们组织自我防卫课程来抵抗强奸……之后他们成为反色情电影和拉皮条的武装先锋……她们不实施武装斗争，但她使用直接暴力行动来抵抗色情电影院，砸窗子等……其他团队会用更加暴力的斗争方法，尤其是那些抵抗黑工招聘（lavoro nero）的斗士……她们烧掉了 [ 雇佣黑工来代替与工会签订了合同的正规工厂的非法 ] 黑工作坊（covi di lavoro nero），但是她们没有武器……这些行动都是妇

女自己进行的，没有男人参与。

关于女性自主主义者与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关系，这位被采访者继续说：

[女权运动中]温和派比较流行……由很多不同的团队组成……她们不会顾及阶级的问题……其中比较激进的有“妇女解放运动”（Movimento per la Liberazione della Donna），她们既不是女性分离主义者，又完全不会考虑到阶级的问题……她们的人特别多……她们认为我们[女性自主主义者]是非常服从的，而她们确是对的，我们当时就是[很服从男人的]。我们很年轻……我是比较晚才接触女权主义的……当时我会参加女权示威，但只是为了主张避孕和抵抗工厂对女工的剥削，但我在那很久以后才有了女权意识觉醒……当时我的阶级意识很强烈……我以为女权主义者在把运动给分裂……这就是为什么“不断斗争”和“组织起来的工人自主”在1975年袭击了罗马的妇女游行，

因为她们被看成是分裂分子。

## 结 论

意大利的女权主义、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在 1970 年代，围绕着无偿再生产劳动和性暴力、身体暴力进行过短时间的、问题多多的联合。到 1990 年代，前工人主义者和自主女权者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继续做生态女权主义角度的研究，非常关注农民和渔民发起的粮食主权运动；吉尔安娜·弗兰卡·达拉·科斯特现在研究小额资助在不同国家的实践；莱翁波迪亚·佛图拉提成为一名在传播理论上非常著名的专家；劳拉·科拉迪（Laura Corradi）成为一名学者，并卷入了生态女权主义全球化运动；艾莉莎·德尔·热成为帕多瓦市绿色政党的本土委员。在关于对 1970 年代更广泛的女权运动和自主社会运动的讨论中，通过把无偿家务劳动议题置于核心地位，当今意大利女权主义更被工人主义深刻影响，但是也经常和“工人核心”一类的理念爆出距

离。这个议题的定义至今仍然是未解决，但是已经迈向通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发展的道路，比如“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理论。她们发起的国际“基本工资网络”也许能够针对新自由主义资本瓦解了福利国家这个问题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法。“家务有偿化”运动最近的一个重要进展是，意大利东北地区的威尼托地方政府决定为家中照顾工作付款了。这是这种工作第一次作为社会服务被正式地承认和付以报酬。

最后，如果要总结被工人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与1970年代意大利妇女运动中其他形式的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前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对“平等”和“解放”的诉求不仅混淆了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使得有偿男性工人与无偿女性家庭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变得神秘化。工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后者一般认为家庭外的工作给妇女提供了一条向解放和经济独立的道路，而“女权斗争”和“家务有偿化”都认为妇女在家庭外的有偿剥削不能解决家庭内无偿剥削的问题。至于分离主义的女权主

义者，“家务有偿化”的意大利网络与前者同意要排斥男人参加女权组织和会议（除为了照顾小孩子以外），可是谢尔玛·詹姆斯所参加的英国“家务有偿化”网络“Payday”最后允许男人参加。（那时候，在1978年后普遍镇压影响下，意大利的“家务有偿化”网络已经瓦解了。）

直到今天，工人主义的女权主义及其“家务有偿化”运动仍然有意义。例如，2001年以来，为了对应以男性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和战争，她们组织了一系列的“全球妇女罢工”行动，该行动的诉求是“对一切关爱工作（caring work）得到认可和报酬，以及使各国的军费开支归到我们社区，妇女正好是我们社区的主要关爱者”。

珠三角翻译小组 译



联合策划：实践论 OnPractice  
同时 Companion

## 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

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

谢尔玛·詹姆斯

马新 Orpheus 邓宁立 译

---

副本制作 (<http://fuben.org>)

责任编辑/校对：冯俊华

开本：130×184mm 字数：61,000

2017年10月第2版